



趙敏恒著

胡道安閱

重慶天地出版社版

採訪十五年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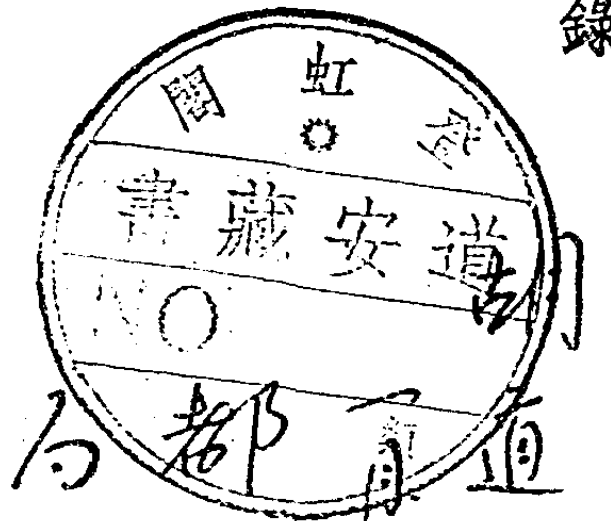
新聞戰綫社叢書總序

馬序

謝序

- (一) 踏進了新聞王國
- (二) 由米蘇里到哥倫比亞
- (三) 回到祖國·故都開始新聞工作
- (四) 工作成敗決定在極平凡人手中
- (五) 助成中央社收回發稿權
- (六) 隨蔣委員長上江西前綫
- (七) 「九一八」時的緊張工作

採訪十五年目錄



道安
九一八
被購于青島
其書多



3 0227 3098 4

- (八) 與英大使鬱浦森失和
- (九) 我採訪到了失蹤的藏本
- (十) 密電碼的錯誤
- (十一) 一個人替四個通訊社發報
- (十二) 民主政治與民意測量
- (十三) 南太平洋台赫梯島之夢
- (十四) 紫金山下的記者精神
- (十五) 「人心思漢」憶漢口
- (十六) 一個女記者的自殺
- (十七) 兩面鏡子
- (十八) 做傻子？還是做聰明人
- (十九) 蔣委員長接談五分鐘
- (二十) 與周恩來的一段公案

- (二一) 初到重慶的觀感
- (二二) 太太幾乎死在大轟炸中
- (二三) 我和我的學生們
- (二四) 我看新聞教育
- (二五) 長沙觀戰·鄂西祝捷
- (二六) 重慶外國記者之家
- (二七) 新聞發佈的幾個問題
- (二八) 專談新聞檢查
- (二九) 新聞寫作質疑
- (三〇) 尾聲

探訪十五年目錄

新聞戰線社叢書總序

中國新聞事業的開始，早于世界任何國家，形質兼備，至今已近二千年的歷史，但是，不可否認的，自從現代新聞觀念形成以來，中國就落了後。工業革命成功，西方新聞事業，一日千里，中國新聞事業，因為受了農業社會的羈絆，却一天天往下坡路走，所以，中國第一個現代新聞事業的建立，便假諸外人之手。自國父倡導革命，以至抗戰開始前，這四十餘年間，中國新聞事業有很快的發展，但真正進入世界新聞事業的領域，還是抗戰以後的事。在過去，文人論政之風，成爲中國報紙的靈魂，此種風氣，現在仍舊繼續，不過，抗戰的確發揚了中國新聞事業的精神，加速了中國新聞事業的進步。抗戰以來，中國新聞記者的筆槍報國，已與前線武裝殺敵的將士，定下了同樣的功勞，而盡忠職守至死不屈的報人和陷身敵後從事地下報紙的記者，更用血寫下了中國新聞事業史的光榮一頁。他孺：新聞領域的擴大，新聞教育的扶植，新聞內容的充實，新聞素質的淨化，新聞表現

的嚴整，新聞技術的改進，以及輿論權威的樹立，國際宣傳的加強，事業經營的企業之路的確立，事業建設的工業基礎的奠定，還有附帶的國民知識水準的提高，國民外交活動的促進，無一不顯示中國新聞事業在抗戰期中有重大的成就。僅就重慶報紙在敵機大轟炸下于防空洞中編輯，印刷一例而言，已經受到國外新聞同業的普遍珍視。中國的社會學家，一致承認：中國的社會，因為抗戰提早進步了廿年直至五十年。我們相信，中國的新聞學家，也一定承認：中國的新聞事業，因為抗戰，可以提早迎頭趕上美英新聞王國。在未來的新聞世界中，中國的新聞事業，一定能根據對反侵略戰爭的貢獻，配合國家的政治地位，形成世界新聞事業的領導力量之一。世界新聞大憲章的實現，中國新聞事業將為遠東的主流，並為戰後和平的輿論支柱。本社就基于這個信念，在三年前誕生了，從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到今天，我們一直寄托這個信念在新聞戰線月刊上。三年來，國內外同業的指導和支援，更加強了我們工作的勇氣，同時，三年來，事實也告訴我們：中國新聞事業理論研究的貧乏和物質條件的困難，所以我們希望也可以說大胆的嘗試，就已有的努力，完成一部比較有內容的新聞學叢書。這裏面，大部分蒐集已在新聞戰線月刊發表的文章，另外一

小部分承新聞學季刊的幫助，同時收集幾篇具有同類性質與同等價值的作品。當然，此外也有特約的專著。至于這一嘗試的成功與失敗，我們的讀者，自將為我們最公正的評判人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重慶

採訪十五年總序

馬序

採訪十五年，是趙敏恆先生努力新聞事業十五年經驗的總匯。他寶貴的經驗與心得，許多地方，是值得青年記者學習與參考的，他對於新聞事業各部門提出的意見，許多地方是很正確很公允的。

我把這部大作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只覺得文字非常流暢，敘述極其坦白，有許多故事，幽默得令人發笑不止，也有許多故事，使人感想萬千，敏恆先生所用採訪新聞的方法，有些是我不能同意的，但是沒有一件不充份表示出他們的努力，他的機智，他的爲着新聞而犧牲一切的精神，例如五三五四大轟炸時他採訪的情形，無疑的會使每個讀者感動。

全書中時時透露出他的國家的懷戀情緒，他處處覺得以一個中國人而爲外國通訊社服務爲不正常；相信敏恆先生一定有一天利用他十五年以上的寶貴經驗，爲純粹中國的新聞事業，開一新路，同時相信，以他那種不計虛榮，不求富貴的精神，對於獨立的超然的公，正而真實的新聞事業必有貢獻！

他這一部書，是一口氣寫成的，洋洋數萬言，不能自休，當然充份表示出他的熱誠，他的真實，他的個性的每一點。惟我以為有些小的地方，如對於一些政治人物的批評，對於一些記者的形容，似乎可以更含蓄些，蕪蕪之獻，不知作者以為然否？

新中國新聞事業需要創造的積極的精神，作者十五年的生活中，充滿着此種精神，這一點，本書對於無數有志於新聞事業之青年，必有極好的幫助！

馬星野 三十二年之冬，重慶

謝序

作者在這本書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人們一生職業的選擇常常是偶然的」，當然他決定做新聞記者，固是偶然，而動筆寫這本書，也是偶然。

記得去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新聞戰線社主編先生，到我們家裏和敏恆談天，話題慢慢拉到新聞戰線上來，就說想請敏恆把這多年記者生活的經驗，陸續寫交該刊發表，當時敏恆因為事忙，而且從來沒有用中文寫過長篇的東西，同時又覺得本身的經驗並不夠，所以馬上婉婉拒絕；後經再三來信敦促，未便固却，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終於將此稿的第一章完成了，倉卒間擬題為：「十五年記者生活回憶錄」。并附了一封信，大意好像是說明着筆的動機，在想把他從學生時代起到現在為止所遭遇的一切有關新聞事業的問題，提供同業參考。

從那時候起，斷斷續續的寫了一年，此稿居然也有了相當的字數，在今年十一月底，敏恆與中國訪英團同機赴英前，主編先生表示亦想將此稿交天地出版社出版，并列為新聞

戰線社叢書之一。最初敏恆是持反對意見的。因為他總覺得不完整的東西，最好還是不要印行，後來他說明亟於編印新聞戰線社叢書的願望，乃於登機前夕，草完最後三章。當然十五年的歲月，並不太短，以五萬多字的文章，是僅能畫出一個輪廓的，不過在這裏要聲明，雖然只是一個輪廓，却有不少政治新聞的外史。

敏恆作了十五年的新聞記者。我也作了十四年新聞記者的太太，在他十五年的採訪生活中，我曾經爲了他的工作的艱辛，在另有較好的機會時，勸過他改行，我他曾經爲了他的工作不能離開危險地域，幾乎死在敵人的大轟炸中；但是我總以堅定不移，富貴無動於中，始終爲着新聞事業努力，而尊敬他。現在敏恆尙滯留倫敦，而此書即將問世，我就大胆地代他寫一序言，並將此書獻給在戰爭中走向成功的中國新聞界。

最後我要替敏恆感謝于右任先生的題簽，馬星野先生的作序，陸鏗先生的編輯和周培敬先生的校正！

謝蘭郁序於重慶巴中太平洋戰事爆發兩周年紀念日

一 踏進了新聞王國

人們一生，職業的選擇，常常是偶然的，民國十一年，我在北京國學專修業，(南)

天，看見北京英文快報登一啓事，徵求翻譯編輯，由中文譯英文，我就辭了原職，去

；過了幾天，接到該報來信，約我將中文短篇小說譯成英文，每天刊載五百字，酬金每月

二十元；一個十八歲的高中學生，忽然發現自己的寫作，每天可見報，每月還有幾個零用

錢，心中自然十分興奮。於是，就開始翻「小說月報」，「星期六」等小說雜誌，尋找材

料，不久，英文快報裏，每天也就有一欄中英文對照的譯稿，像賣花女郎等陸續刊出。到

十二年春天，畢業出美，很自然的就選擇新聞為專修科，但是美國那個大學有較完善的新聞

學系呢？那時學校當局也真莫明其妙，把美國七八十個大學年刊全數送來，由學生自己選

擇，像瞎貓捉死老鼠一樣，我決定去科羅拉多大學，理由僅僅是該大學年刊裏載有新聞學

課程，並且有很美麗的校址風景照片。到了科羅拉多溫泉後，去學校報到，學校當局非常歡

迎，教務主任準備替我排課程表，問我願入文科或理科，我回答說要學新聞，這位教務主

任大吃一驚，聲明該校並無新聞學課程，我說你們年刊裏會載有新聞學課程，他趕緊解釋

說我們隔一年開辦一次新聞學班，不巧今年不辦，好在新聞學和英文文學沒有多大分別，你就挑選英文文學課程吧！我們准許你入大學四年級，一年可畢業，明年你再到其他學校專習新聞學課程。事到如此，我也沒有辦法，只好讀了一年的莎士比亞戲劇，查士爾文選，文學批評，短篇小說寫作等課程。可是到今天，我絲毫不懊悔，因為那一年的課程，對於我以後的工作，的確有莫大助益：第一、我英文寫作有相當進步，第二、特寫的技巧得到很多。第三、以後於寫戲劇批評和新書介紹等稿時，感覺很多便利，這也算因禍得福。因此我時常感覺，新聞系學生，預備科的課程，內應當有文學一項，不過這是事後回想，當時我並不覺得這些課程，於我有若何利益，糊裏糊塗混過一年，得了英文文學士學位，離開了山明水秀的科羅拉多溫泉，去舉世聞名的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威廉博士指導下，開始學習新聞學。

我挑選的課程有新聞學原則，採訪、編輯、特寫、廣告、印刷、社評寫作，鄉村報紙，資料編存，新聞寫作，報業管理，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威廉博士每次講述新聞學原則，歷就述新聞界先輩，為維護社會民族權利，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艱辛，不顧生命，前仆

後繼，百折不撓，那種動天地，感鬼神的精神；威廉博士講演時，慷慨激昂，白髮飄蕩，令同學肅然起敬，心中有了永久認識。大家都明白了新聞記者不只是一種職業，還負有偉大的使命。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威廉博士除注重精神學理訓練外，還予學生以充分的實習機會；新聞學院本身辦一日報，名哥倫比亞米蘇里人，與商辦的哥倫比亞講壇報相競爭，新聞學院學生全體都是米蘇里人的幹部，差不多一半時間上課，一半時間參加實際工作，選新聞採訪課程的學生，每週上四小時的講堂，跑四小時新聞。每起個學生從跑新聞起，直到出報止，各種工作，如編輯、校對、廣告、發行、印刷、社評寫作，都有機會參加，這種訓練是在別的新聞學校裏得不到的，我國主辦新聞學校者，很可仿效這種辦法；當然，最理想的，一個新聞學校，能夠發行兩種刊物，就是日報和週刊。

十四年夏天，行畢業禮的時候，來校演講的貴賓中，有位美國合衆社副社長兼海外部長富瑞先生，他告訴我，經相當時期訓練後，或可派我到合衆社中國分社工作。關於記者訓練問題，富瑞先生有很好的意見。他說：一般初問世的記者，都希望到大都會裏負有聲

望的報紙，或通訊社工作，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每每極有希望的青年記者，被無情的大都會埋沒了他們的前途。一個青年記者，能力薄弱經驗缺乏，到了大都會裏，不容易插進那些有悠久歷史的新聞組織，就是他微倖能找到工作，一定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在龐大的組織中，人才濟濟，百事紛繁，沒有人理會他，沒有人有時間來指導他，他本人好比石沉大海，不易出頭露面，不久就被捲入那都市中成千成萬工作糊口人們的潮流裏去。同時青年記者，最初也不宜到鄉村裏去，因為鄉村裏的新聞事業組織，過於簡單，且偏重於地方新聞，在那裏，不能得到新知識，不能學到新技術，孤陋寡聞，慢慢的會有落伍的危險。富瑞先生的結論就是：我應當到一個不大不小的城市裏去。於是，他寫了一封介紹信，介紹我到哥羅拉多省省城丹佛，在丹佛快報報工作。

丹佛快報是斯屈僕斯——霍瓦德報業公司（該公司除主辦合衆通訊社外，在美國各處尚經營有二十餘家報紙）的所屬新聞事業之一，為小型報紙，讀者以工人佔重要部份。總編輯名懷波，為合衆社名記者之一，原任合衆社駐華盛頓特派員，後因酷嗜杯中物，體力精神均恐不繼，被調任丹佛快報總編輯，以資修養。懷波先生文筆秀麗，每日「老實

話」一欄，頗受讀者歡迎，林白幼子被綁時，案情轟動全國，懷波先生東山再起，爲台衆社專寫此項新聞。並有「林白案」一書，聞名於世。我到丹佛快報後，被目爲客卿，上自總編輯，下至排字工友，均予我以種種便利，對於報館裏工作情形，均詳爲解釋，我工作有錯誤處，他們都予我以糾正指導，在採訪部裏，我學習了些美國式的新聞採訪技術，記得有一次美國漁業家會議在丹佛城舉行，採訪部主任叫我去會場隨便找一位比較年輕漂亮的女代表，問他魚類是否多妻？另外派位攝影記者隨我同去，幾位女代表都承認多妻情形。在魚類是很普通的；在我進行訪問工作時，這幾位攝影記者也找了一位漂亮小姐，將玉影攝入鏡頭，第二天報上，漁業專家會議新聞只有這欄，我寫魚類多妻的特例，反倒佔了兩欄的篇幅。

二 由米蘇里到哥倫比亞

十四年的秋天，我決定離開丹佛到紐約去，一方面可以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我的新聞學術研究，一方面可以到世界報業最發達的中心區，開開眼界，得點新智識。一到紐約，

我就去合衆社總社拜訪富瑞先生，劈頭一句，他問我幾時回到中國去，我表示暫時不願回中國，他大怒之下，說你是中國人，不回中國去，在美國幹什麼？你一天不回中國去，你一天不要來見我。接着，我去見美國聯合通訊社總經理古柏先生，他很高興的說：我們在中國很需要你這樣人才，不過我要預先聲明的，就是你不能作我們中國分社主任。這並不是你能力問題，而是我們政策問題，美聯社各分社負責人必須爲美國人，我說：我並不打算立刻回中國去。古柏先生和富瑞先生一樣的看法，在美國他們不需要中國人作記者。經過這兩次的失敗，我覺得在紐約報界工作的希望，幾乎等於零。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到世界通訊社總編輯霍浦先生，他曾經去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講演過，他問我在紐約作什麼，我告訴他：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系讀書，同時希望找點實際工作，他馬上就說你白天讀書，晚上來世界通訊社工作。

這樣，我就開始了半工半讀，每天十六小時工作的生活。因爲我希望於三年內得新聞學碩士學位，白天上八小時課，晚上在通訊社裏作八小時工，上午八時上課，下午五時下課，趕地底火車進城，晚上七小時在通訊社上班，下午三時下班，四時趕回住宅就寢。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系那年有幾位出色的教授，書報介紹和戲劇批評教授威爾斯先生，當時替紐約時報星期書報特刊寫文章，社評寫作教授班德先生替紐約時報寫社評；特寫教授畢德金先生，寫了一部轟動全世界的著作「人生于四十歲開始」；新聞採訪教授畢色先生，擔任紐約世界日報副總編輯，對我感情最好；而給我教益最多的，除了畢色外，還有班德，畢德金兩位先生。班德先生常帶我到紐約時報去，解釋報館內部工作情形，當時紐約時報寫社評的共有五人，社評部在報館大廈最高一層樓，每人一間辦公室，另外有間會議室，當中有個很完備的圖書資料室，五人每天中午在會議室聚餐，討論本日各問題，彼此交換意見，推定幾位寫社評，因此，社評裏的意見，不是個人的，而是大家研究討論後的結論，僅由一人執筆而已。紐約時報印報房，確為偉觀，五十公尺對方，二十公尺高的空間，全是輪轉機，同時開動，聲震天地，印報房裏無法交談，印報工人每人有塊石板，用粉筆寫字筆談。印報房裏機器種類很多，有印攝影畫報的，有印星期雜誌的，有印每天報紙的，印好，數好，包好，送上運輸卡車，都是自動了，不用絲毫人工，印報排字房裏，燈光都是淺紫色，據說可以保護工作人員的目力。

畢德金先生對於我的寫作最賞識，年終攷試時給我超等學分，據說是他老人家破例之舉，他常對同學們說我將來能作一成名的作家。回想起來，很慚愧，十五年來天天跑新聞，從來沒有也不敢嘗試一篇長篇寫作。記得畢德金先生當時常約我去談天，批評我的寫作。他的結論有兩點：（一）寫作的成功或失敗在第一句，最多不出頭三句，三句話還不能捉住讀者的興趣，其餘的等于廢話。（二）人們崇相成功，欣賞喜劇，對於失敗悲劇，很少感覺興趣，美國最成功的雜誌推財富，就是這個道理。至于畢色先生，爲人極穩重和平，常約我替世界日報寫關於中國問題的稿件。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一年，雖然得了新聞學碩士學位，然而學校方面對於我，可以說並沒有什麼賜予，所得到的一點學識，都是幾位教授課外私人接觸的結果。新聞學校本身沒有刊物，在校沒有實地練習的機會，總難令人滿意。同時學生受了相當基本訓練後，應當給他們機會，和新聞界先輩常有接觸機會，那種精神上技術上的影響，是教室絕對得不到的。

我去世界通訊社報到後，霍浦先生就介紹我給執行編輯威斯特先生，一切工作由後者

支配，威斯特先生最初很不高興，派一個學生，又是一個中國人來工作，用諷刺的口吻介紹我予編輯部同人說：這位中國人的學位，比我們全社的人數還多。國際新聞編輯密勒說：我的位子讓你最妥當。大家哄堂大笑。我早已下了決心，任何侮辱，都一概忍受，非自己打出江山不可。威斯特先生每天沒有工作給我，只差遣我出去送信，送電報，這樣過了一星期，有天邁亞米分社來了一封信，他說：我很忙，你替我答覆吧！我把覆信的信稿給他看時，他喜出望外，說我是個很好的祕書，他正需要這樣一個人，他辦公桌上堆滿了各分社的信件，叫我替他清理一下，一一作覆；整整忙了一個月，纔把這工作辦完。從此以後，他的態度大改，看我對於國際情形有相當認識，於是派我做國際新聞編輯的助手，這位光頭矮胖的密勒先生，也和顏悅色的把編寫國外電訊的方法，一一解釋給我聽。國外新聞電報，爲節省電費起見，極力設法縮短字數，急電僅二三字，普通電也不過數十字，同時爲省事起見，創造了很多「電字」，一字可代表二三字，四五字不等，倫敦來電「閣辭」二字，國際新聞編輯就要寫出「英國內閣今日呈請辭職」，並添進此次辭職前因後果。國際新聞編輯，對於每日國際情形的進展，都要隨時注意，由國外來電，無論是柏林、巴

黎、日內瓦，一看就能十分明白電文的事實和意義，不但好像一部世界知識年鑑，還要有點測字先生未卜先知的能力，事實上人的記憶力有限，而且時間上也不允許編輯們慢慢的去追憶舊事。所以密勒先生身邊有最近出版的各國年鑑，各國地圖，以供參攷。不久，我被派任紐約波士頓幹線編輯，這纔算開始我的獨當一面的正式新聞記者工作，所謂幹線編輯，是近代新聞交通事業進展的一個出產品，凡訂世界通訊社新聞稿的報館，裝有自動機，有專線直通世界通訊社紐約總社裏的自動機，總社新聞稿在自動機上開出後，同時各家訂戶的自動機也同樣的開出，總社把美國各州，各大都市劃分作幾大幹線，每幹線在紐約總社有總機專供給新聞予該幹線各訂戶，幹線按各區訂戶的需要，選擇編輯該幹線新聞稿，紐約本市新聞，波士頓報紙大半不用，就是所用字數也不相同，這工作是最繁重的，自動機廿四小時不停的發稿，發報的速度與打字的速度相差無幾，同時要發字數不同或方式不同的新聞稿，每逢有重要擊拳錦標賽，編輯部裏簡直變成瘋人院，每家通訊社，最少有三位記者在場，一位專發「動作紀錄」，即每擊一拳，每動一步都立時發電，另一位，專寫「每合一」記載，還有一位專寫賽場拾零，總社裏幾位編輯先生，東奔西跑，在自動機前，跳來

跑去，口裏不住的喊：紐約二百字，芝加哥三百字，波士頓五十字，再加上美國報紙每天出七八次報，清晨出家庭訂戶報，上午九時出金融市場報，午時出午報，下午出體育新聞報。晚上有晚報，午夜十二時出外埠報，上午三時出早報，當中還發幾次號外，同樣新聞，我們要改寫七八次，以便各報隨時選用，每次出報時都有新鮮材料，到早晨三時下班時，人疲倦得連說話都不願開口，趕緊趕到樓下對街一小飯館裏喝了一大杯咖啡再乘地底火車回家休息，準備八時再去學校上課，這樣生活過了一年多，那時學校也畢業了，不過新聞並沒有什么麼博士學位，同時，我被推為留美學生月報總編輯。

三 回到祖國故都開始記者生活

革命軍攻下武漢後，美國社會和報紙對於中國問題，忽感興趣，時常有人請我演講，寫稿，我就脫離了世界通訊社，以全副精力，時間，去寫留美學生月報，同時去各處講演，替報紙雜誌寫文章。在這時期，我認識了幾位美國、日本、印度注意遠東問題的著作家，一位白佛爾先生，他曾任上海大陸報總編輯，他的著作很多，最有名的是「白人的負擔

」，他夫妻二人常同我來往，十九年我在南京時，他們還來看我。印度作家達思先生，常替我在留美學生月報裏寫文章，他有一長篇著作「英國與西藏」，在月報裏發表後，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法名教授本恩還在講義裏引用這篇文章。達思先生後來介紹我與日本著名作家河上清先生相見，河上清先生那時任大阪每日新聞駐華盛頓特派員，等於日本在美國的非正式發言人，美國報紙雜誌上時常有他的文章，他與達思二人，正在鼓吹大亞細亞主義，主張中國、日本、印度，聯盟抵制歐美；河上清先生並主張我去日本住兩年，一切費用由南滿鐵路擔負，我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他又提議我去東三省各地看看，我也沒有答應他。到十六年春天。北京英文導報總編輯克拉克到紐約來看我，他勸我不必長居美國，還是早點回中國去；他對於導報那時的總編輯亞本非常不滿意，他答應我到北京後，立刻辭退亞本，任我爲副總編輯。（亞本離開了導報後，過了約一年浪人生活，後來被紐約時報試用爲北京訪員，不久調到上海，竟作了該報駐中國代表；因一度曾被我國政府驅逐境，加上他寫了幾部關於遠東問題的書，居然也算爲名記者，直到太平洋戰事爆發前一年他方脫離了紐約時報）於是於於十六年五月間，離開紐約，渡大西洋，經倫敦、巴黎、柏林、

華沙、莫斯科，由西北利亞返國。

導報方面的工作雖然相當繁重，但是比較在美國的新聞工作情形，就覺得很容易很簡單，一切編輯、採訪、校對、排版、看大樣、完全由我一人包辦；克拉克先生每天僅來報館裏寫篇社評，處理些營業方面的事務。我每天上午工作多半看看由郵局寄來的上海美國報紙雜誌，挑選幾篇重要的寫作品，交排字房排印，作第三四版稿。導報還訂有美國之四、五的照片，滑稽畫及特寫稿，凡與時事有關的照片，趕即製版，登在第一版；其他稿件，分發在第三四版，下午開始發第一版的新聞稿，大半都是通訊社稿，有路透、合衆、東方、電通、國聞、復旦、遠東等，採用最多的是路透社稿，合衆稿很少，可是上海的長篇通訊，時常有很好的材料。日本兩家通訊社，消息都靠不住，英文文學簡直不通，可是他們在我國各大都市均有特派員，電報也很多，發報，發稿都不受當地政府檢查，在我國全國性的通訊社沒有成立，內政不修，內戰紛起的時候，我國報紙，竟不得不依賴這種專門造謠生事，挑撥離間的日本通訊社來供給新聞糧食，實在令人寒心，同時也是我國新聞事業一個極大恥辱。東方社新聞稿比較尚可用，電通稿可以說滿紙荒唐，當時我國通訊社稿最可

看的要算國聞，但是除上海有專電，天津有長途電話稿外，大半都是本市新聞。遠東社稿幾乎全部是德國海通社的廣播稿，英文文字不整理簡直不能用，夜間作校對工作，等路透社國聞的最後一次稿，發第一欄新聞，整理後排第一版，看大樣，午夜一時左右工作完畢。我最初在報館裏工作的時候，營業部，編輯部，印刷部的同事對我態度很壞，因為他們在外國人領導下工作時間過久，養成一種奴隸性，以為只有外國人纔行，中國人就不行，後來看克拉克把一切編輯工作，完全交給我，從不過問，我又常常自己下排字房，教他們新方法，新格式，他們纔改變態度，事事聽我指揮。

導報編輯室裏時常有各國駐北京記者來談天，芝加哥講壇報記者德雷，每天必來報到，他的謠言最多，話匣子一開就不容易停，我們有時聽煩了，就繼續工作，讓他一人自言自語。美聯社者巴部，原在東京美人主辦之日本廣知報任編輯，後因追求社長的小姐失戀，辭職來北京，終日狂飲消愁，毫不振作，滿城衛報記者田伯烈，曾替我們寫了一篇很精彩的濟南慘案目睹記，日軍進攻濟南時，他正在城裏，路上遇見日兵，日兵不准他在街上行走，叫他爬過街邊短牆，他是一個洋秀才，從來沒有上過體育場，怎樣也爬不過去，可是

日兵用刺刀在他的臀部一戮，六尺短牆，一躍而過。從此以後他的仇日情緒，也日益增高。當時，在北京，各國都有很好的宣傳機構，而我們中國反倒沒有，最活躍的當然是日本，除日本駐華公使時常在公使館接見各國記者，東方電通發通訊稿外，中文報紙有順天時報，英文報紙有華北標準報。美國公使也隨時在公使館接見美國記者，通訊社有合衆社，報紙有北京導報及天津華北明星報。法國有法文北京日報和北京政治月刊。英國有天津出版的北京天津時報及路透通訊社。德國有遠東通訊社，及天津德文日報。蘇聯有羅斯達通訊社。而中國政府反倒沒有發布消息的機構。十六年冬季，導報館開始收到由南京郵寄來的中央通訊社稿，社址書明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內容僅有南京中央黨部消息，偶爾也有各地通訊，那時南京到北京郵件，必得經上海，天津轉寄，費時甚久，該稿到北京時，已成舊聞了。導報的死對頭是華北標準報，華北標準報經費由南滿鐵路擔負，社長是日人，主筆是英國浪人高爾門，高爾門係酒色之徒，出入於東城船板胡同白俄酒排間，每日在第一版以大字寫社評，痛詆我國，專爲日人宣傳；但因其私德太壞，文筆下流，以致引起在北京各國人士的反感，反而失了日方宣傳作用，不久日人就將該報停刊，調高爾門任大連滿

洲日報編輯。

我到北京不久，就有人介紹我去看國聞通訊社胡政之先生，胡先生談到日本通訊社操縱我國新聞問題，希望我國早日能成立一全國性的通訊社。由胡先生的介紹，認識了國聞社北平分社主任金誠夫先生，金先生以後同我每晚必通一次電話，交換新聞。那時我回國不久，人地生疏，北京當時政治軍事消息幾乎全靠金先生供給，金先生的長處在穩，作人渾厚，我們二人在新聞採訪工作上成了好友。後來我去南京任路透社記者，金先生任大公报駐南京記者，還是保持我們的友誼和聯絡。在導報工作的時候，我還嘗試過幾天教授生活，有位同學結婚去歐洲度蜜月，約我去中國大學代幾個月課，課程是英文文學批評，但學生英文程度太差，幾乎無法上課，等於教初級英文，每個學生都表示在高中及大學在二年級時，英文教授太壞，又加以自己不認真，以致毫無根基，毫無所得，就升級升學反而害了他們，到大學三四年級時，再想學已來不及了。以後到其他大學裏教書，每每看見同樣情形。更可驚異的，就是這樣畢業的學生，居然也到中學裏去教英文，豈不誤了多少青年學子？記得當時課室裏常常滿座，並有很多旁聽學生，理由是每次上完課，學生都不走

，要我講點新聞，他們聽講新聞，比任何課程都感覺興趣，我時常想學校爲什麼不增加一門每日新聞或時事述評的課程？青年們對於時事異常注意，但是因爲學識經驗幼稚的關係，不能領略時事發展的前因後果，感覺到報紙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同時他們自己也缺少分析判斷的能力，如有好的新聞記者每天講一小時的時事分析課，於學生一定有很大的益處。我在導報與克拉克相處極好，我唯一感覺頭痛的事，就是應付那位克拉克太太，她時常到報館裏來，不是有朋友要寫文章在導報發表，就是有朋友開畫展，要我在第一版就新聞大爲介紹，我多半置之不理，她哭哭啼啼的向丈夫那裏去告狀，幸而克拉克甚識大體，說導報新聞稿完全由我編發，他不便干涉，不過有時給太太逼急了，也只好紅着臉，請我勉爲其難。從這點經驗，我感覺到辦公室確有與太太分家的必要，因此我結婚後，第一樁事就是告訴我太太，辦公室裏她絕對不許去。十七年革命軍攻下北京後，唐悅良來北京接收舊外交部檔案，在外交大樓招待外賓及各界，茶會席上遇到與唐悅良同來的鄺堃先生，我在清華中學二年級，鄺先生教我英文，得他的指導，我那年獲全級英文演說冠軍，想不到十一年後又相遇。他聽說我會去美專習新聞，且在導報工作，非常高興，表示外交部

正擬設情報處，很需要我這樣的人，希望我能去爲他幫忙，我也就毫不遲疑的應允他一定去。大約一月後，我接到鄺先生由南京來電，請我立即去南京外交部工作，我那時對於中國世故人情，簡直是門外漢，並不問明職位和待遇，只知道我是中國人，政府出錢給我受完好的教育，我能盡所學爲政府工作，是義不容辭的事；尤其是在我老教授下工作，想一切決可滿意，同時中國政治中心已遷移到南京，北京一定轉變成爲一個古董，僅僅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有他的地位，絕非新聞記者久居之地，接到電報後，我當天就向克拉克提出辭呈，他很不願意我走，但是我意志十分堅決，立時整理行裝，於十七年八月到達南京。

四 「工作成敗決定在極平凡的手中」

我到南京滿腔熱血，一進外交部，一切所見所聞，給我迎頭潑了一桶冷水，部裏排擠鄺先生的運動，正在積極進行，鄺先生名爲情報處長，處裏重要人員全由其他方面派定，給我一個空頭位職，待遇很低，只有我在北京導報薪金的半數；這還不重要，處裏人員，終日無事可作，辦公室裏的工作，不外看報寫信，批評處裏或者部裏人員，評頭論腳，活

像一羣老太婆；下辦公室，就是些無聊的應酬，科員捧科長，科長捧司長，司長捧部長次長，部裏一切人員的時間精神，完全用在如何逢迎上司，如何排擠異己。說一句公平話，部中也有能作事，努力作事的人，像歐美司長徐謨，秘書謝冠生等，不過那究竟是鳳毛麟角，極少數的人，鄺先生也是束手無策，預料不久必定被迫離開情報處。正在這時候，我接到美國聯合通訊社駐上海記者海里斯來電說接紐約總社來電，邀我任美聯社駐南京代表，約我去上海一談。鄺先生立時主張我再回新聞記者生活，表示官場生活，太痛苦，不如早點脫離。於是鄺先生陪我一同去看外交部王儒堂部長，王部長也表示情報處最重要工作是國際宣傳，我在外國通訊社裏工作，所得效果，一定比在外交部還要大，極力贊成我加入美聯社，並且很誠懇的表示，以後一定隨時給我幫助。王部長那番話，並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因為一直到他於十年離開外交部，這三年裏他處處給我以工作上的便利和扶助我到上海和海里斯見面，幾分鐘裏，就決定一切，他請我到美僑俱樂部吃午飯，在座的還有路透社遠東總編輯考克斯先生，考克斯聽說美聯社請我任駐南京記者，表示路透社也想在南京有個記者，向海里斯提議請我同時担任美聯社和路透社兩家駐南京記者，那時美聯社和

路透社有密切合作合同，故海里斯也同意這辦法，普通新聞都供給路透社，只有與美國有關的特殊新聞，供給美聯社，如此，我就回南京恢復了我舊日新聞記者生活。

那時的外國報社駐南京記者工作很簡單，同時也很困難，簡單的是沒有很激烈的競爭，除兩家日本通訊社外，別國報社記者都在上海，南京沒有代表，同我競爭的只有日本聯合和電通社。各國在南京還沒有設立使館，很少有重要國際新聞發生，最困難的是交通工具問題，京滬間電報比火車還要慢，政府沒有發布新聞的機構，因此也不注意新聞發布的問題，全南京沒有一家通訊社稿可看，新聞絕對不檢查；日本記者慣例造謠，發些離奇電報，每天大半工作消耗在調查和糾正日方謠言。我一回南京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京滬間新聞傳遞方法，最初利用特別快車，每日外交部有專差搭特別快車去滬，我就與外部交涉妥當請部專差每日與我帶信到上海路透社，有一次國民政府頒佈新關稅則，電報太慢，全文太長，我就拿新稅則全文自己趕特別快車去上海，利用在火車上時間譯成英文，當晚上時到上海，就將全文發表，而財政部的公報，到次日纔在上海發表。後來利用火車辦法漸漸也不行了。日本通訊社開始發加急新聞電來同我競爭，我於是改用長途電話，這個辦法很好，

也很經濟，五分鐘只收費三元一角，不分晝夜，隨要隨到；中英國稅條約簽字那天，簽字後王部長立刻以電話通知我，所以那天中英文條約簽字後五分鐘，我的電報就到倫敦，倫敦外部因還未接到藍浦森公使的電報，竟予以否認，第二天接到官電後，纔向路透社道歉。中波條約也是一樣。波蘭政府接到路透社簽字電報，來電問波蘭公使的時候，波蘭公報條約的官電，還沒有發出。不過利用長途電話情形，不是每次如此順利的，接線生有時不盡職，線路不清時，就替你接上，剛接上上海電話，電話裏就只聽見蘇州常州間婦女談家務，你喊破了喉嚨，上海也聽不見，上海說話你也聽不見，等到他們談完了，你剛要說話，接線生說時間到了，就把電話線折斷，有時氣得考克斯同我暴躁如雷，嗓子叫啞，滿頭大汗。後來日本記者也利用長途電話，這就麻煩了，他們不分晝夜，總是掛加急電話，每五分鐘九元三角，不但不經濟，而且也不容易叫通，平常你上午掛加急，已經太晚，因為日本記者們已經掛了幾十號加急電話；於是不得不另想辦法，過年過節都請長途電話台台台職員吃飯，好在中國人總講點交情，每逢十分重要事件發生，這幾位接線生都極力幫忙，把日本記者的加急電話，每次扣出一分鐘，三次後就可讓我通三分鐘的話。有一位老

前輩說得好：「新聞記者必得人緣好，什麼都不要得罪，朋友愈多，愈有辦法，有時工作成功或失敗，也許就決定在極平凡的人們手中。」長途電話漸變成京滬間新聞傳遞的重要工具，上海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等南京記者，每日也由長途電話發出數千字，他們經長時間的經驗和研究結果，得到叫報電報碼字為最快最正確的傳遞新聞方法。

五、助成中央社收回新聞發稿權

我在南京開始記者工作的時候，最感覺困難的，就是對於當時的政治人事，軍事演變，缺少認識，事情發生的意義和將來發展的趨勢，毫無頭緒。我時常去京報館請教於該報主筆賴景瑚先生，總編輯石信嘉先生，和採訪部主任羅佩秋先生。京報館在估衣廊教堂樓上，我常去上課，聽他們分析當時形勢，纔漸漸明瞭當時政治背景以及各要人的歷史和個性，石先生判斷能力很強，他的預測大半是實現的；羅佩秋先生跑新聞很努力，隨說隨作；有時我問他某件新聞是否確實，他說你稍坐我去問問，半小時後，他就回來，將該新聞源源本本都說出來。雖然京報館不久停辦，但我同石信嘉先生的友誼和合作，是繼續維

持下去。當時日本記者在南京的很多，也很努力，與我在業務上競爭的有日聯社的龜谷利一，電通社的小林德，龜谷利一比較正派，對於中國至少沒有仇視態度，小林德則不然，完全流氓氣，坐在家裏製造新聞。我記得總理靈南移，預定專車次日清晨到浦口，小林德清早過江前，就先發一急電說專車已到浦口，將中樞要人在車站迎接的情形，寫得很詳細，並有和某要人的談話，而事實上專車誤點，到第二天纔到浦口。這種作法，是新聞記者的大忌，而在他却是家常便飯，不算一回事。不過龜谷利一很受影響，日聯社總社覺得他不努力，竟將他調去北平。像小林德這樣作風，在外國也很多，不過新聞事業日益進步，報紙水準提高，記者的水準也提高，不負責任的報紙不負責任的記者，終久會讓社會淘汰的。

我在南京工作有兩年（十七年至十九年）最艱難也最痛苦。那時反英反帝國主義情緒極高，到處都碰釘子，一般人們感覺得路透社是英帝國主義的宣傳機構，我是英帝國主義走狗，種種排斥，我都忍受，埋頭苦幹；我的惟一精神上的安慰，就是我盡了我的新聞記者職務，並且得了一個知己。路透遠東總編輯考克斯先生，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每日都通

電話，常有書信往來，我也常去上海看他，漸漸成了最知己的朋友；社中有關中國的新聞和事務的處理，他必和我商量，也都尊重我的意見，因此路透社以前仇視國民黨和鄙視中國人的態度，完全更改，很多小事可以看出。上海路透社外籍職員廁所門口書明「華人不得入內」，這個歧視中國人的惡例，被我打破了。外灘上海俱樂部，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大本營，從來沒有中國來賓，考克斯有天請我去吃飯，在大廳裏簽名簿上寫了我的名字，據說還是破天荒第一次。不過我的心裏總覺得個人的力量究意有限，這種私人友誼的關係，不能有永久性，比較澈底的辦法，還是要中國自己有健全的全國性的通訊。再則，外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必須想法早日收回。但是，那時我們並沒有全國性的通訊社，國聞通訊社僅在上海發稿，自己根本沒有電報，完全靠由報紙上譯成英文，供給上海外文報紙。中央通訊社規模很小，僅有南京中央黨部消息。我那時感覺唯一希望在加強中央通訊社組織，由中央社與路透社成立新聞交換合同，一則可以提高中央社的國際地位，再則也可開始收回新聞發稿權。我向各方面提出這個辦法，他們當時都一笑置之，因為他們並不重視這問題，同時也不相信我有能力使路透社就範，直等到二十年瀋陽事變發生，大家纔感覺到

國際宣傳的重要，中宣部程副部長天放打電話給我，他說：你以前所談的辦法，能否進行？如果可以辦，合同隨時可以簽訂。我喜出望外，打長途電話給路透社遠東總經理鄒爾勒先生，請他立刻到南京，他問什麼事那樣急，我說你到南京再說。次晨，鄒爾勒偕同繼任遠東總經理張士樂先生乘飛機到南京，立刻與程天放先生會同起草中央社與路透社交換新聞合同，當天上午得最高當局同意後，即在三牌樓。國際聯歡社樓上客廳內簽字，中央社方面代表人爲程天放與陳布雷先生。回想這件事的經過，好像作了一場夢。老實說：我事先毫無把握，路透社方面究竟願意不願意這樣作，我根本沒有問過他們，只是憑着青年人一股勇氣，邁步向前，腦筋裏從來不轉失敗的念頭；，這種勇氣是青年的至寶，我相信今天我決沒有那樣勇氣，也決不會採用那種進行方式，事事一定多加考慮，結果也許比較更完滿，但證時間上一定比較遲緩些。就拿跑新聞來說吧！我現在已遠不如以前了；漸漸染上了一種懶惰心理，設法偷工減料，拿種種理由來替自己解釋。

李頓代表團到南京時，蔣委員長夫婦在勵志社宴請代表團，我也設法在餐室隔壁的彈子房裏，記下各人演講詞。李頓代表團的報告書，我也曾事先得到全文，我爲得到該報告書

全文，很費心思，外交部方面很細心，報告書交打字生時，每張打字紙都編有號頭，凡用過紙張，均無法取出，不過他們沒有注意到複寫紙，複寫紙只用一次，向亮光處一照，字跡十分清楚，我就靠這張複寫紙，把報告書擇要比別人早四小時發出。現在情形就不同了，能省力就省，沒有以前那種硬幹傻幹的精神，我時常想：跑新聞是青年記者的樂園，至少跑新聞的人們，應當有青年記者的勇氣和毅力。

六 隨蔣委員長上江西前綫

在南京作了九年記者，到前綫去，只有兩次，而且兩次都走走江西。二十年夏天，蔣委員長去南昌指揮剿共軍事，吳醒亞等隨行。石信嘉拉我同去，得到倫敦和上海總社同意後，我們就乘輪去江西；一到南昌，先拜訪何總參謀長，他的辦公室在一中學校的教室裏，牆上掛滿了江西地圖，中央軍隊和紅軍的位置，番號，人數以及進攻方向，都很顯明的寫在地圖上，何總參謀長把當時軍事形勢很詳細的同我們說明，並告訴我們第二天清晨他去臨川前綫，我們立刻請求陪同前往，不過何總參謀長覺得前綫太危險，且交通也不便（

當時只有水路可通，沒有接受我們的請求。在南昌住了一星期，毫無消息可發，電報從南昌到上海，平均要費三天，同時接到上海電報說：林白有由日本飛往南京消息，我就決定趕回南京去。這回初次嘗試戰地記者生活，結果是大大的失敗。可是因爲此次的失敗，得了很寶貴的經驗：（一）戰地記者不到前線去，寫不出好新聞，司令部的戰報裏所得資料，大半都太平凡，記者寫稿時，有腳不落實地的感覺。（二）通訊真十分重要，有好新聞發不出去，等於白費，並且戰地記者不應當只注意到發電報，同時還要寫長篇通訊，電報只能報道緊急重要消息，當地風土民情的描寫和戰事發展的背景，却是通訊稿的好材料，我去江西後關於電報通訊的拍發，始終沒有滿意的辦法，如何能不失敗。（三）戰地記者不應當依賴官方，尤其是交通問題，我住在南昌，希望官方替我解決一切到前線去交通問題，當然是要失敗的，當時我應該有勇氣和決心，自己趕差船或者甚至於至自己雇船上臨川去。官方每每顧慮到記者的舒適安全，不願多負責任，有時甚至於有一打仗都來不及，那有開功夫去招待記者」的感想。戰地記者如果能自力更生，少麻煩官方，工作上一定可多有成就。天下事每每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我從江西回來，心中非常懊惱，總覺得自己太

不努力，可是後來接得倫敦總社的每月工作報告，才發現總社方面對於我去江西工作，非常滿意，報告書裏，大書特書，說我去江西是外國通訊社第一次派記者隨同蔣委員長去前綫採訪新聞，並把我和何總參謀長的談話，在報告書裏擇要登載。

第二次去江西是在廿五年冬天，我方邀請各國記者去江西視察，由南昌到臨川，南豐，廣昌，甯都等地，那時航空郵寄剛剛開始，我就決定極力設法利用航空快信，多寫通訊稿，同時我很不明白的，就是沒有一家中國報館有記者陪同前去，於是我自告奮勇替南京新民報寫通訊，每天夜裏各位記者們都睡了，我仍然點着洋蠟，替路透社寫英文通訊稿，替新民報寫中文通訊稿，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中文寫新聞稿。最奇怪的就是我愈寫愈有勁，後來反而替路透社寫的少，替新民報寫的多。這個道理，說來也很簡單，我是中國人，替外國通訊社作事，用英文寫新聞稿，總是極不正常的現象，不問將來能不能用中文寫新聞，能不能參加中國新聞事業，至少我應當望那方向去努力。

這次去江西，路上有一件很小的事，使我想起新聞記者往往只注意到別人的一舉一動，而對於自己的言行過於疏忽，時常因為很小的過失，影響到自己的工作。同行記者中有

一位上海大陸報記者布克門，年齡很輕，新近來中國，我們由廣昌到甯都途中，在汽車上談起共產黨問題，這位布克門君忽高唱國際歌，也許在他是無所爲，可是從那次以後，大家都離開他遠遠的，並且招待記者團的人們，對於他的行動，也不免時時特別注意了。還有一點，就是記者們對於自己的工作，應當先作一點準備功夫，不然的話，要處處感覺困難。我記得我們到甯都後，羅卓英軍長和記者們談共產黨的歷史，提起「立三路線」，「羅明路線」等，這幾位外國記者莫名其妙，東問西問，問話又非常幼稚，結果是談話的收穫很少。最理想的，是記者對於所談的問題，能與談話的人有同等的認識，既可提高談話人的興趣，又可十分明瞭談話人的思路。一般記者們，每每覺得採訪工作是片面的，只聽別人說話就夠了，這是很重大的錯誤因爲假使你對於所談的問題沒有充分研究過，一則談話人感覺到好像對牛彈琴，不願談，更不願多談，再則就是情願多談，也是白費，因爲最精彩，最重要的部份，每每你不能領會。

七 一九一八—時的緊張工作

瀋陽事變的發生，和路透社中央社新聞交換合同的成立，加重了我的工作和責任；除日夜採訪南京方面消息外，還要收國外來電譯成中文交中央社，同時在南京開始發路透社英文稿，一切工作由我一人包辦。翻譯新聞稿在我是初次經驗，這種工作的經驗，給我幾種感想：（一）翻譯新聞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工作，甚至於比寫新聞還要難，中英文都要很好，英文原稿不僅能看得懂，還要能充分明瞭原文字句運用的輕重和意味，譯文不僅將原意寫出，還要有聲有色，翻譯不難，翻得好，確實難。（二）翻譯工作並非苦差事，寫文章的人多半不願幹翻譯工作，以為這是乾枯無味的工作，事實並不如此，每每翻譯有獨到之處時，心中愉快情況，不亞於訪到一條好新聞，寫出一篇好文章。（三）翻譯的訣竅在千萬不要一字一句翻，先把全篇新話看完，捉住全篇要點後再動筆，然後一氣呵成。不然的話有上句不接下句之病。（四）因文字不同，社會環境風俗不同，原文直譯時，讀者會莫明其妙，不知所云，翻譯人遇到這類情形，應當不怕麻煩，除翻譯正文外，還要加以解

釋，說得源源本本，纔能引起讀者興趣。（五）翻譯人必得十分明瞭原文的意義，不懂時，一定要細細研究，研究不出，再請教別人，實在無法時，寧可刪去不譯，千萬不能亂猜；譯新聞電時，原電字句常有錯誤，自己應有判斷能力，不能一味照原電翻譯。（六）還有一點，就是新聞電爲節省電費，舊事每每不重提，如某船沉沒，淹死十九人，翻譯人必查出舊電，將該船如何沉沒，何時沉沒，肇事地點在何處，一一寫入，不然，譯文就有禿頭禿腦之病。

路透社與中央社簽訂新聞交換合同時，正是日軍進攻東三省，日內瓦國聯開會的時候，爲隨時供給中央社最後消息起見，路透社上海遠東總社二十四小時不斷供給南京消息，本身在上海，夜間十一時即截稿時以致上海各報所登路透社國際新聞，大半是我在南京譯交中央社，各報駐南京記者，再用長途電話轉回上海各報。

當時有一最困難問題，就是電訊轉達太慢，上海拍來電報，每每需時八小時以上，中宣部與交通部交涉無結果，後由中央特許路透社於上海南京兩地設立無線電台，直接通報，於是，我的工作又加上了管理無線電台一項。事實上，這是最令我頭痛的一項工作，每

逢到最緊張階段，電台一定出問題，百無一失，不是波長不對，就是干擾太烈，時常急得我面紅耳赤，啼笑皆非，無論你是否偷天換日的本領，見了這班報務員，也是毫無辦法。你說電報非通不可，他答一聲〇ㄝㄝ（干擾），就把發電機關了。我記得：二十一年下關日艦砲擊獅子山那夜，全城燈光熄滅，雞犬無聲，中山路上，我軍跑步至江邊應戰，情形緊張萬分，兩位報務員跑來說：「我們在家裏有父母兒女妻子，很對不起趙先生。」于是，來了個臨陣脫逃，揚長而去。幸而領班周紹高非常鎮靜，能負責任向我說：「趙先生，不要緊，有我！」我們用被單把門窗蓋嚴，我寫稿，他發報，從夜間十一時，一直工作到次日午時，周君負責鎮靜苦幹精神，給我一很深刻印象，我立刻拍電到倫敦，稱贊周君的工作，每月薪金加到五百元；在二十一年，報務員薪金有五百元，恐怕不是破例，也是很少有的。

有自備電台，能直接通報，工作上當然有種種便利，不過外國通訊社在我國有自備電台，不僅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爲應付一切的困難，纔有這種從權的辦法；當然不應長久這樣做下去。所以，一年後，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先生向我提出修

改合同，收回電台的時候，我立時同意，向路透社方面交涉，將南京上海電台，全部移交中央社，這就是中央社全國電訊網成立的起點。

八 與英大使藍浦森失和

從二十年起，由南京到漢口，由漢口到重慶，幹了十二年的分社主任，管理了十二年分社事務，心中老實覺得新聞事業方面的人事問題，似乎有調整的必要；每每某地記者工作相當成功後，總社就派他作該地分社主任，或者甚至調任總社總經理，同時記者們也希望如此，頭腦裏以爲作新聞記者同作官一樣，只要升官發財，總是好事。比如：作記者時希望作分社主任，作分社主任時，希望作總社社長。我的觀感不是如此，擔任採訪新聞工作的人，不應當要他負事務上的責任，好外勤，不一定是事務人才，就算他是多才多藝，能跑到新聞，又能處理社務，也不應當增加他事務上的負擔，減少他跑新聞的時間和精力。我很坦白的說：這幾年，爲處理分社事務，我的正常新聞採訪工作，受了很嚴重的影響，這種類似升官制度，不是提拔人才，而是摧毀人才。好外勤，應當一生只幹外勤，好編

輯，應當一生只幹一生編輯，作新聞記者的，不應當爭名奪利，而應當求事業的成功；主持新聞事業的人們，不要用主任，總經理等官銜來獎勵人才，事業成功可以給努力者以精神上的安慰，增高待遇，可以給努力者一點物質上的酬勞。在英美新聞事業領域中，這種例子很多：美聯社裏最負盛名，資格最老的，是一位外勤記者密爾斯先生（此公已於去歲逝世），他的薪金比總編輯還高，全社裏上上下下都尊敬他，可是他老人家到上海漢口時，不但不作分社主任，還受分社主任指揮。好外勤記者，不叫他去跑新聞，叫他去報賬，買紙張，訂廣告合同，那豈不是害苦了他？

二十一年與二十六年之間，正是多事之秋，值得我回憶的事件很多，我先略述我與英大使藍浦森失和的一段故事：「一二八」滬戰爆發，英大使由北平兼程去南京，未到的前一天晚上，英大使參贊英格蘭姆（此人已於德機轟炸倫敦時，在防空義勇隊的崗位上殉職）告我，藍浦森到南京後即轉滬，設法調停中日戰爭。我將此消息作新聞拍出，第二天下午英大使到南京後，看見上海報紙載有此項新聞，大發雷霆，打電話約我去，我一進他的辦公室，他就盛怒的說：「你沒有得我許可，如何可以亂發消息？你不能指揮我的行動

，我要上那裏去，我就上那裏去。」我回答他：「消息不正確，你可以否認。」他接着又問我消息的來源，我說：「新聞記者有保守新聞源祕密的責任。」他說：「我命令你說出來。」我說：「我是中國人，不受你管。」他更生氣了，他說：「路透社是英國通訊社。」我答覆他：「我對路透社負責，而不對你負責」。就轉身走出去。藍浦森立時發電子路透社倫敦總社及上海遠東總社提出兩個要求：（一）更正該項新聞，（二）把我撤換。倫敦總社覆電，完全拒絕他的要求，因為路透社五十年來沒有發過更正消息，而此次絕無更正的理由（藍浦森大使到南京後，第三天就去上海）。撤換我的一點，沒有考慮的餘地，一則路透社對我十分信任，再則路透社不容許任何人干涉社內人事問題。我提起這段故事，為的是希望主持新聞事業的人們，要特別注意到兩點：（一）對於本社記者，要絕對信任。（二）如有問題，報社一定要負責到底，不得出賣人情，犧牲小記者。新聞界要維持整個新聞界的地位，整個新聞事業的尊嚴，基本條件就要替小記者們撐腰，我與藍浦森大使這段糾紛的結局，頗為圓滿，不久他就被調為駐埃及大使，臨行前，忽親筆來函約我去吃飯，表示希望我把過去的事完全忘掉。

九 我採訪到了失蹤的藏本

西安事變的新聞報道，也有幾段故事。那天上午九時半左右，中樞某要人忽然自打電話來，問我西安有無電報來，我說沒有；他再問路透社在西安有無記者，是否有無線電台，我說沒有，他把電話掛了。我愈想愈覺離奇，決定向各方尋找線索交通當局的消息是隴海車只通華陰，他們的判斷是兵變，於是當天上午第一個電報出去是西安兵變。十一時左右，聽說蔣委員長在西安，不過同時也有極可靠方面消息，委員長不在西安城內而在華清池，前一日還有電報到南京；再者，中央有軍隊一師駐咸陽，華清池至咸陽有汽車可通，如有事變，委員長可到咸陽，有空軍的協助，該師可堅守咸陽，中央援軍可由潼關趕去。一時傳說紛紜，直至收到西安廣播，西安事變真像始大白。

這樣重大一件新聞的得來，不是我去找別人要消息，而是別人找來要消息，乍看來，很覺滑稽，事實並不如此，很多重要新聞都是這樣得來的，新聞記者應當時時注意這類情形，細細研究別人的動態，甚至於從反面得到正面新聞。同時，我們也可看出拿新聞換新

開的辦法是決無一失，你有消息，別人時常向你要消息，你給他十條消息，他給你一條消息，這個買賣就值得作。你消息愈多，與你交換消息的人也愈多，自然而然的，你的消息來源也與日俱增了。反過來說，你老向別人要消息，自己一點消息也沒有，你的工作就很難得到成功。比如當時接到某要人電話後，立刻打電話與交通當局稱，聽說西安有問題，他說西安情形他不知道，只接到電話說隴海車只通華陰，恐怕是兵變。我再打電話與某當局說，聽說西安有問題，火車只通華陰，他第一句話就說委員長恐怕也在西安，採訪新聞不能希望一次得到全部消息，得到一部份就利用這一部份消息去找第二部份，同時，除了本身努力外，報社方面也要注意，時時將最後消息供給記者，一則記者可利用這種消息，培植他的新聞網，將來採訪新聞可獲種種便利，再則根據別處新聞，可以得本地新聞。譬如日本向英美宣戰，重慶記者立刻可以訪問我國當局，探聽我國政府的態度。我在南京時，路透社遠東總編輯考克斯先生，報告我的新聞，就不比我所發出消息少，至少也相等。

日本外務省情局長天羽，在東京招待各國記者席間，指名我電的一次，是為藏本事件。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忽失蹤，日本當局堅稱藏本為我方殺害，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

小題大做，與我方交涉時聲色俱厲，日艦雲集下關江面，一時形勢緊張萬分，謠傳日本海軍陸戰隊即開進南京，我忽接到南京警察廳偵緝隊長趙世瑞來電話藏本已在明孝陵山上尋獲，惟恐交還日方後，日本仍狡賴，故約我立刻去與藏本談話，將談話發出後，再把藏本交還日方。我走進警察廳會客室時，趙君就告藏本說，有新聞記者要和他談話，藏本當時拒絕接見記者，表示在見須磨總領事前，不擬發表說話。我一時情急智生，走向前與藏本握手說：「我是青年會代表特來慰問你」。他非常感激，竟大談而特談，滿腹牢騷，完全吐盡。說他在中國多年，竟屢受排擠，不能升官，他走的那天晚上，須磨總領事不准他參加外部宴會，而派他去火車站看管大使的行李，他覺得人生無味，決計自殺，出日領館後，步行出中山門登紫金山，夜宿山洞中，飢餓難忍時，曾下山至孝陵街買麵吃，被獲時，彼正在明孝陵山上樹下午睡。此篇談話，在國內外發表後，藏本事件，成爲國際間笑談，日方憤怒之下，竟指明罵我並非記者，而是中國一個最毒的宣傳員。那時考克斯正在東京，卽席與天羽爭辯，罵天羽不能侮辱一個新聞記者，侮辱他的朋友，雙方幾至動武。

倫敦總社來電報恭賀我的成功，事實上，我只坐享其成，並不是我的努力，而是別人

給我一個好機會。這一件事可以證明：一個記者所代表的新聞機關在社會上的地位，與他本身的工作，有着重大的影響，所代表的新聞機關有地位，要佔很多的便宜，如果沒有地位，也每每被人冷視。因爲一般人只注意新聞或通訊社的地位，而不注意記者個人的能力，甚至想利用有地位的記者或通訊社作他們的宣傳工具。不過，記者們只要只想在大報社工作，而不注意自己的努力，好像一進大報社的門，自己的工作 and 地位就有保證了，這是很不健全的思想，一個記者的希望，應當是報社由他而得光榮，而不是自己沾報社的光。

天羽在「七七」事前發被派爲駐瑞士公使，路過南京，外部設宴招待，我亦被邀，徐叔謨次長介紹我時，天羽大吃一驚，指着我說：「原來是你」——席間交談甚久，他說：「我歡迎你去東京作路透社代表」，我說他作外務省大臣時，我一定去；他說如果我去東京時，他一定仍回東京去作情報局長，並加一句：「因爲在日本，情報局長比外務省大臣還重要得多」。今日天羽已榮任情報局總裁，而我對他的玩笑的諾言恐怕此生難以履行了。

十 密電碼的錯誤

記者用密碼發新聞電或發參考電，時常會出亂子。二十一年日軍進攻淞滬時，和戰之說不一，我方黨政軍領袖某日在南京舉行主腦會議，決定抵抗。當日下午專車載各要人由浦口開往洛陽，李任潮先生登車前勸我送家屬至內地，我乃發一密電予路透社遠東總經理張士樂稱：「中國決抵抗，將送家屬至內地，我自己則留南京」。當時路透社所用密電本，係英國內地會所用密電本，電本中無「抵抗」字樣，只有「作戰」，不得已乃用「作戰」，因係私人參考電，想不致有問題；不料張士樂接着此電，與總編輯奧立佛會商後，竟作新聞電發倫敦稱「中國決對日宣戰」，雖然事後張士樂向我道歉，可是亂子是已經出了。

政府當局每每不能體諒新聞記者，因見地不同，時常以為新聞記者誠心和他們為難，事實並不如此。在南京時，有一天報紙上發表一篇財政部發言人談話，公布當時各項收入及開支數目，表示收支不敷數字甚大。我把這篇談話作新聞電發出，財政當局大為不滿，說那談話發表的目的是對內而不對外，發表至國外後將影響我國國際間金融信用，財政當局堅持我須發更正新聞電，說明前次電報不確；我表示財政當局可發表更正消息，而我不能

發，因為過錯不在我，責任不能推到我身上；雙方爭持下，徒傷感情。一般人以為更正新聞等於家常便飯，不算一回事；不過在新聞記者立場上說，更正新聞是極嚴重的事件。一家報紙，一位記者，所刊載或所拍發的新聞，如果可以隨便更正，這家報紙和這位記者的信譽，就不值一文了。每家報紙和每個記者，對於自己新聞正確性的寶貴，要如同女子保持她的貞操一樣。

在南京擔任採訪工作最無聊的部份，是每天走衙門抄官報，每天下午必得跑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等處，各機關均有專任接見新聞記者人員，他們的職務並不直接發表消息，也不答覆新聞記者的問話，每天僅將油印好的中央常會決議案，國民政府命令，行政院會議決議案，外交部收發照會等公佈新聞，分發予各記者，到時各記者坐在會客室或新聞記者招待室裏，靜候發表油印「講義」。每個記者衣襟上都是掛滿了各機關所發來賓證，同時屋子裏擠滿了二三十位記者，抽機關所備紙煙，工友忙着倒茶，油印「講義」拿到手，一哄而散，再去第二家衙門把這齣戲照樣再演一次。每天工作如此，竟也算是新聞記者。那時各機關還有個壞習慣，有所謂記者津貼，凡是常去走動的記者，每人每月

領津貼二十元三十元不等，南京機關很多，有位記者據說是來者不拒，少多不論，每月也可領到一千元上下的津貼。同時野雞報館通訊社非常多，聽說有一家甲報，自己並不出報，與另外一家乙報約定，每天乙報把自己報印好後，換一換報頭，再印一道，就算甲報；於是甲報主辦人名片上可寫上甲報社長字樣，向各機關要津貼，向人敲竹槓。當時南京記者良莠不齊，雖然流氓記者不少，可是確實努力新聞記者工作的也有，上海新聞報的俞樹立，申報的金華亭，中央日報的嚴慎予，都是好外勤記者。俞樹立，金華亭二位的新聞來源大半靠邵力子先生，邵先生那時等於是總司令部的主任秘書。嚴慎予新聞來源大半靠葉楚傖先生。葉先生邵先生都是新聞界先進，與當時黨政軍方面都有密切聯繫，對於新聞的運用又有充分認識，所以俞金嚴三位，常常有很精采的新聞在報端上出現，每天跑衙門的情形，自從中央社組織健全後，也就無形的消滅了。

十一 一個人替四個通訊社發報

那幾年內與我在工作上競爭的有位張繼英女士和林芳白先生，二位都是美國合衆社駐

南京記者、張女士在美國米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畢業，比我早一年，女子擔任記者，算是很早的。她工作很賣力，吃虧的終於是女子，老害羞。我記得有一段故事，她到南京後去拜訪外交部徐叔謨次長，一見面，徐次長說好像面熟，張士女面紅耳赤奪門而去，再也不去見徐次長了。原因是，張士女在上海時，有某小報和他開玩笑，她向法院起訴，徐次長那時任法院法官，判決該小報賠償張士女名譽損失洋一元，張士女以為奇恥大辱，不想又與徐次長在南京相遇。繼張女士在南京任合衆社記者的，爲林芳白先生，林君曾任漢口自由西報總編輯，能寫也跑新聞，確是我工作上的一位勁敵；有一天我和他說，我希望我們有一天不彼此競爭，而在一起合作，我想到這句話竟成事實。不久合衆社更動遼東總經理人選，林芳白辭去合衆社職務，我很興奮的介紹他進出路透社任廣州分社主任，那時我希望把路透社在中國分社主任都換中國人。北平分社主任已經我的建議另派孫瑞芹担任，只有漢口分社主任及天津分社主任還是英國人。可惜我的希望未能夠實現，孫瑞芹及林芳伯均因事被撤換。這點小挫折，給我一很深刻的教訓，就是孤掌難鳴。一件事業的成功，必得有好幫手，無論計劃如何好，無論機會如何好，沒有人總不行，這也是我以

後注意新聞教育，愛護後進青年的一重大起因。

瀋陽事變後有一個時期，我曾同時替七家報館通訊發專報，除路透社美聯社外，還替倫敦每日電訊報發電報。有一天接到美國國際新聞社及世界通訊社總編輯來電：「中國趙敏恆請廿四小時代發電報」，這樣一件無住址電報，居然於廿四小時內送到。我回電說：「已代路透社美聯社發電，不能再兼任。過幾天，國際社駐北平記者格蒂由上海飛南京，堅請我代發電報說：中日戰事，美國報紙異常注意，國際社及世界通訊社南京不能沒有代表，只要我願代發電報，用任何人姓名皆可。當年住在紐約世界通訊社時，同人代我頗厚，難以拒絕，故用太太姓名發電，因此外交部外籍記者登記單上，也有了「謝蘭郁」一名。最離奇的是日本日聯社社長也來急電，請我每天代發新聞，並且發加急電報，一則因為這事來得太離奇，二則我代日聯社發電，深恐引起我官方誤會，我就去看外交部王儒堂部長，他經過慎重考慮後，准許我發電。他說：「日本人替我們付宣傳電費，有何不可。」並特別通知交通部不得扣留我所發予日聯社之電報，大版朝日新聞托路透社倫敦總社代請我替該社發專電，蘇聯塔斯社駐中國記者哲爾羅夫也約我代表發電報，那時中蘇邦交尚未正式恢復，蘇聯

在南京並無使領館，哲爾羅夫由莫斯科到南京時，真可謂舉目無親，他住旅館，租房子，都要有人担保。他來找我替他担保時他說「我們彼此不認識，我以一個新聞記者地位，來請另一新聞記者幫忙」。我正在考慮時，他說「你不放心嗎？我向你保證，決不作非法行動」我笑着說：「你一定不收藏炸彈，或圖謀不軌嗎」？他也笑了說：「難道你心目中蘇聯人都是手裏拿炸彈嗎」？我二人一見如故，覺得這位陌生的蘇聯記者可以作朋友，我就替他担保，此後時常在一起談天，他被調到上海時，表示希望我替塔斯社在南京發電報，我說我既非蘇聯人，又非共產黨，如何可替塔斯社做事，他回答我說：「新聞是沒有國籍，沒有政黨的」。哲爾羅夫現任塔斯社莫斯科總社國外部總編輯，所有塔斯社發往國外各分社電報，皆由哲爾羅夫負責。

廿二年，我脫離美聯社，專任路透社駐南京記者的原因很複雜。路透社與美聯社的密切合作本有很多年的歷史，美聯社依賴路透社供給歐洲和遠東方新聞，雙方成立諒解，不侵犯彼此所謂「勢力範圍」。後來美聯社國外通訊網日益健全，並不完全賴路透社供新聞，且美聯社有在遠東發稿之計劃，因此彼此意見日深，終止所訂合作合同。路透社總

經理堅持我須辭去美聯社職務，同時美聯社駐上海遠東代表海里斯，爲人只顧自己，不管別人，有功歸己，有罪歸人，時常發電予分社代表，作無理的要求，北平有事也問南京要消息，廣州有事也問南京消息，想起什麼事都問，一天要接到他好幾個電報要消息，弄得我煩不勝煩。他還有個毛病，你要不答覆他，他明天再來一個電報質問你，「何以昨天的電報不答覆」。你供給他好消息，他發到紐約總社，用他自己名字，別人徒勞無功；因此我決議辭去美聯社職務，他雖退回我的信，不接受我的辭呈，我也不理會他。

總社時常注意各地新聞的發展是應該的，因爲總社應當察看每天整個新聞局勢，指示各地記者工作，作有系統的採訪，不過指示應合理，不要以小專去麻煩人，而且記者都是人，脫離不了人情，你一方面督察他們，一方面還得獎勵他們，人家賣了力氣，不但自己無功，你還坐享其成，誰人願爲你出力，所以海里斯這種作風，只有失敗的，凡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無人不怨聲載道，有機會就另謀出路了。

十二 民主政治與民意測量

自瀋陽事變發生後，在中國各外國通訊社犯了嚴重錯誤，就是以極低待遇，雇用臨時記者，原因是因爲工作突然加重，由本國派人來中國，一則時間不允許，二則費用太大，所以各通訊社都在當地雇用臨時記者，待遇既低，工作又無保障，自然難以找到台式人選；毫無經驗毫無修養的人，一成爲記者，結果是記者的水準一落千丈，笑話百出。我記得路透社駐瀋陽記者一電報說高粱中游擊隊異常活躍，上海社裏新聘一位女編輯，不知高粱爲何物，竟轉電倫敦稱「中國軍隊在高粱將軍指揮下異常活躍」。我覺得這問題值得注意，因爲我一向擁護精兵主義，以極高待遇，聘用最理想的人才，給他工作保障，給他生活保障，使他安心工作，以全副精力爲社裏服務，甯可少用人。反過來說，用一大批廢物，工作絲毫無把握，到緊要關頭，誤事後再去設法補救，已太晚了。

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是我這幾年工作歷史中最快慰的一頁。二十一年蕭同茲先生任中央社社長後，極力加強該社的組織和工作，我自美歸國後，一直就希望我國有代表通訊社的產生，不管自己能力地位若何低微，能盡一分心力當然得盡一分心力。蕭先生很希望能收回各國通訊社在華發稿權，路透社既然首先與中央社有合作關係，就先由路透社方

面下手，那時各國在我國租界享受領事裁判等治外法權，在華各地記者所發消息，不僅在
外國也在中國發表，有無意，也有故意造謠的，他們的立場和背景與我們不同，所以時常
有離奇或不利我國的消息刊布。收回發稿權，確有必要。路透社方面最初反對這個提議，
衷心理由有兩點：（一）路透社是純粹商業性組織，中國內政統一，新聞事業日漸發達，
正是他們所希望而決不願放棄的良好商場。（二）各國通訊社彼此競爭極為激烈，你退我
進，隨時都在短兵相接，他們怕將發稿權交予中央社後，被其他通訊社壓倒。後來經蕭
先生說明收回發稿權是遲早問題，終久必得辦到，發稿權交中央社後，路透社稿在華發佈
範圍和效率，只有增進。後來始決定在華中文發稿權，完全交予中央社，路透社暫時保留
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漢口，青島，廣州等地的英文發稿權。同時，路透社各地無
線電台交予中央社的交涉，也很順利的解決。瀋陽事變時，爲應付臨時局面，中央社與路
透社成立設立電台合同，條文於我方頗多不利處，解除合同須於一年前通知，且必得雙方
同意，換一句話說，只要路透社不同意，他們可以永遠在我國設立電台。事實上外國通訊
社在我國設立電台，是件很危險的事，我也很不贊同，所以蕭先生提出收回電台，由中央

社自辦的時候，我完全同意，路透社方面也很爽快的應允了。「七七」事變後，兩方面的合作精神，更有良好的表現，路透社方面自動提議將稿費減半，中央社在上海，北平，天津，青島等地發稿有困難，由路透社代為發稿，關於電台問題，路透社也給予中央社很多幫忙，爲此事路透社上海工程師張某曾被日方捕去。近年來，中央社英文部國外部均有擴充，合衆社英文發稿權已收回，故提議將路透社英文發稿權亦收回，（此事正在交涉中，我在原則上當然贊同，但是我覺得有兩點值得研究的：（一）租界和治外法權撤銷後，外國通訊社向我國政府登記，接受我國政府一切管理新聞專業法令，應否能執行其合法業務，戰前新聞封鎖政策，現在已有放棄趨勢，如合衆社在英國，印度等地發稿，路透社在美國發稿。（二）爲新聞事業的前途，是否有保持業務上競爭的必要？中國應當有代表通訊社，但是其他通訊社有無存在必要？在美國有三大通訊社：美聯社，合衆社和國際社，彼此競爭的激烈，無與倫比，競爭的結果，只有增進工作效率。在英國有路透社與英國合衆社的競爭，自美國參戰後，美聯社也開始在英國發稿。包辦制度，有利也有害，我國戰後是否需要一個通訊社？一家全國性的報紙？這都是我們應該研究的。我個人向來主張言論

自由，民意是民主政治的最大力量，民意的產生，在新聞事業上可以給予的莫大的助力，因此，新聞事業也就成了民意的測候所。或者將來外國新聞事業在華組織，應當成爲中國公司，資本和主持人員大部份應當是中國人。我更希望戰後我國到處都有好報紙，全國性和地方性的通訊社隨時代需要而日益繁盛。

十二 南太平洋台赫梯島之夢

新聞記者每每以爲自己得消息比別人快，覺得在金融證券市場上作投機買賣，一定百無一失，轉眼即可致富，這是一種最危險的思想。我有很多新聞界朋友，都是爲此而傾家蕩產，我自己也有很苦痛的經驗。新聞記者消息多且快，但是每每在投機市場上失敗，這裏面原因很多：（一）新聞記者得消息快，可是有時太快了，結果市場毫無所聞，價格的上下與理想完全相反，等到真象大白，記者已經賠得山窮水盡了。（二）市場起落常有大批從中操縱，起落情形每每與消息絲毫無關，大戶依賴資本雄厚隨時可以左右市場，記者專靠消息作投機指南，不免常有吃虧情形。（三）新聞記者無論作什麼事，總忘不了自己的職

業，時常只顧到新聞，把自己其他的事情完全忘了。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新聞的重心漸漸移到南京來，最初各國記者多雲集上海。一則便利於採訪上海方面戰事消息，二則上海生活環境比較優裕，三則那時各國記者仍有不重視中國方面消息而儘量採用日方消息之情形，四則在上海可以設法逃避新聞檢查。不過上海戰事向內地移轉後，京滬間交通阻隔，各國在上海記者感覺有與南京方面脫節之趨勢，同時日方宣稱將炸平南京，於是各國記者都紛紛趕到南京，在南京工作的外籍記者，有美聯社麥克丹尼，合衆社愛僕斯坦，塔斯社羅果夫，海通社艾革勒，倫敦泰晤士報麥唐納，紐約時報竇丁，支加哥日報史梯爾，還有幾位攝影記者。蔣委員長在勵志社接見各國記者宣布中國抗戰到底，決不屈服時，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威爾，國際社名記者立克巴克，及合衆社遠東總經理毛里斯等，均由上海趕到南京參加那次盛會。五台山下的美國大使館，變成我們的非正式集合地點，大使館裏有個防空洞，說起來很好笑，土山裏掘了一個二丈深的洞，一個炸彈來，不炸死也被活埋；大家也從來不進洞，每次日本飛機來炸南京的時候，大家站在防洞上的山頭上觀看轟炸情形，日本飛機由頭上飛過炸彈在四週爆發，對

山上高射砲猛烈射擊，各人一點也不怕，回想起來，真有點慫勇。但是，空戰情形，日機被高射砲擊落以及炸彈爆發情形，都一一在望，所以新聞也都寫得有聲有色。十來位記者像一家人一樣，每天中午輪流在夫子廟一帶飯館請吃飯，一有警報，幾部汽車都趕到美國大使館，靜候敵機來臨時臥在草地上談天。記得有一次艾革勒向我表示厭倦記者生活，戰後一定到一荒島上悠遊自在消磨一生；當時我也很表同情，大家研究到什麼地方去，艾革勒主張到南太平洋的台赫梯島去，理由是該島土人極美麗溫和，氣候四季皆春，滿島皆水菓飲食無問題，且不需穿衣，船隻很少靠該島，又無新聞紙，有世外桃源之名。艾革勒建議多帶鏡子，因為該島女子認鏡子為奇物，一見鏡子，都潮湧而來，照了又照，捨不得放下。這位德國記者到重慶後因事被當局驅逐出境，現在柏林總社工作，據云德國當局招待各國記者到前方視察時，常由艾革勒陪行，不知彼心中仍念及台赫梯島否？

十四 紫金山下的記者精神

在南京這幾位外籍記者之臨危不畏忠於職守的精神，很值得介紹於一般同業們，美聯

社麥克丹尼新婚燕爾，夫妻同在南京。麥克丹尼生長在蘇州，一口蘇白，像說爲人都是文質彬彬，畏妻如虎；太太娜塔麗盛氣凌人，開口就罵，麥克丹尼素來就有點神經衰弱，一見太太，雙手發戰，好像打瘧疾，想不到這位記者在日軍進攻南京時，鎮靜異常。日軍先鋒部隊由中山門進中山路向新街口前進時，麥克丹尼自開汽身於槍林彈雨中，迎頭向日軍行列開去，直駛至明陵附近始轉回城內。紐約時報記者賓丁與倫敦泰晤士報記者麥唐納，於日軍進迫城郊時，二人自駕駛汽車出中華門沿京湯公路向牛首山開去，到湯山鎮上，不見一人，覺得有點不對，回到牛首山下我軍陣地，問日軍隊在那裏？他們回答說日軍已攻湯山，你們快點進城吧！這兩位記者趕到中華門時，城外已是一片大火，二人於烈火中衝進中華門。麥唐納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老先生，可是在南京撤退時，有一段極英勇的表現，美砲艦班納號被炸，他也在船上，班納被炸沉後，船上各人逃到江邊，日機低飛用機槍掃射，艦長一腿炸傷，不能移動，臥在地上，麥唐納忽跑過去，睡在艦長身上，拿自己的身體去掩護已受傷的艦長，這樣捨己救人的精神，值得同業們的欽佩。芝加哥日報記者史梯爾在日軍進攻南京後殺傷淫掠無法無天的那幾日中，沒有一天不在街上東奔西跑，採訪新

聞，事後有人說史梯爾冷靜得像黃瓜一樣。

我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狂風暴雨中乘英總領事特派差船，登最後一隻船，離開我九年的崗位，去漢口繼續我的工作，社中給了我一個隨中國政府特派員的名義，南京分社事交予史密斯。史密斯曾任紐芬蘭島鄉村報編輯，來中國前在波斯沙漠裏英國油礦公司任測量員，二十六年秋復來華游歷，在西比亞利火車上遇見路透社遠東總經理張士樂君，到上海後，就找張士樂君尋覓工作，被派到南京來作我的助手。史密斯身材矮小，駝背，不分春夏秋冬，不論天晴下雨，老是披着一件污舊不堪的雨衣，可是此人博覽羣書，爲人忠厚，頗有英國君子風度。我離開南京時可謂隻身出走，衣物全留南京，到南京危急時，史密斯君用盡心力，設法將我衣物運出，連我家中的兩條狗，他都替我運到漢口，不幸的就是只有運狗那條船開到漢口，運衣物的船，都被日本人扣下了。

在漢口工作的一年（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要算抗戰過程中工作最愉快的一年，無論是新聞檢查，新聞採訪，電訊傳遞或生活環境，回想起來，都能令人滿意。

在漢口一年中，關於國際電訊的檢查，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先生負責，董先生是老記者，我國在美國學習新聞的算他最早，外籍記者的工作情形，以及各國報紙通訊的需要，他都十分明瞭，最高當局對他十分信任，他自己也肯負責，因此，關於電訊檢查事，各外籍記者都感覺到便利愉快。董先生的檢查方針很簡單，他常說：中國決不要打仗，日本打中國，中國為自己生存，不得不抵抗，中國沒有不可告人之隱，凡日本反侵略者，沒有不同情中國的，我自己是新聞記者，扣一條新聞，我心裏的難受，同記者的感覺一樣；中國軍隊作戰失利，我們決不瞞人，因為中國根本沒有準備作戰，我們的抗戰決心，是不計勝負的；凡是正確的消息，凡是不危害中國作戰的消息，凡是沒有惡意性的消息，我們一概都放行。董先生自己檢查電報，隨時可以看他，隨時可以和他通電話，他也不用向別人請示，有問題幾分鐘內就可決定；就是他自己扣的電報，你如果有理由，儘管可和他爭辯，如果他錯了，他馬上承認，將扣留電報放行，我記得有一次漢口上空有空戰，我電報裏說我機損失八架，董先生看過電報，回頭向我說，作戰必有損失，究竟損失幾架，我不知道，你是新聞記者應當作正確報道，我相信你，馬上將電報放行。這種雙方互守信用精

神，給駐漢口一般外籍記者一很深刻的印象，也得了很好的收穫，各國記者由漢口發出的電報，沒有不同情中國的，發到外國去的電報字數，也很可觀，同時一般外籍記者待董先生如同一位同業，絲毫不分彼此。我時常感覺到：新聞檢查應當這樣作纔能得到效果，新聞檢查的目的，消極方面阻止不利的消息傳播於國外，積極方面在爭取有利的宣傳，檢查愈嚴，記者們愈設法透露違檢消息，新聞封鎖愈緊，凡是走私的消息，國外報紙愈將視為珍品，爭相刊載，檢查過嚴，有地位的記者不能發展才力，大半設法離去，各國報紙也不重視該地新聞，認為富於宣傳性。再說。消息的透露是無法禁止的，僅是時間問題，電訊的傳遞可以管制，而交通不能完全隔絕，有人來往，就有消息傳遞，道聽途說的消息，正確性更差，檢查過嚴，等於暴露自己的弱點有過不認，有錯怕改。我記得日人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報紙主張政府應當公布損失情形，他們的理由是：美國民族的偉大，可以忍受一切錯誤和打擊，國際宣傳工作的一重要部份，就是得到各國記者的友誼和信任，你天天扣他的電報，天天刪改正確新聞，怎樣能使人發生好感而對你信任？結果是徒徒傷感情，得不到一點效果。他一有機會，仍然要將消息透露出去，更添上些惡意的觀察。我總覺得批

評不是件壞事，錯誤和打擊是人世必有的遭遇，發覺錯誤纔能改過，能忍受打擊纔能還擊，新聞事業對於社會國家最大的供獻，就是能報告事實作建設性的批評，禁止消息的披露，禁止評論的刊載，就是摧殘新聞事業的基礎，阻止社會國家的前進。

十五 「人心思漢」憶漢口

在漢口工作一年間，我方之新聞發佈，確實令為各國記者滿意，每天下午有新開會議，在怡和街國際宣傳處樓下會議室舉行，軍令部第三廳廳長徐培根將軍，每天親自出席報告每日各戰場作戰情形，各國記者對於徐廳長的報告，極為重視，理由是：（一）徐廳長報告軍事消息的態度，非常開誠公布，城鎮失守，無不立時發表，絕不隱瞞。（二）消息迅速，每天新聞會議前，徐廳長必與前方重要戰區長官電話，以電話向成都、重慶、漢口方面空軍指揮官探詢最後空戰消息，故每天新聞會議間所報告消息，都是當天或最後消息，記者們當然沒有不認為滿意的。（三）軍事情形報告得十分簡要，各國記者在中國採訪消息感覺得困難的是不知道背景，只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戰場的地形，據點的重

要性，軍事行動的意義，他們都完全莫明其妙，徐廳長每天軍事報告的精采處，就是凡是不重要或瑣碎的事件，一概不提，只注重在一二重要戰事，可是關於一二重要戰事的報告，有簡明地圖，說明地形，敘述戰事發展之意義，解釋雙方戰略概況，各國記者聽得又能明瞭戰局，又感覺有興趣，因此每天新聞會議都是滿座，在漢口時各記者缺席的很少。

每天新聞會議除徐廳長出席外，尚有政治部郭廳長沫若作政治報告，每星期並常有特約報告，如政治部長陳誠以及馮玉祥周恩來諸氏等，亦曾出席。郭廳長沫若早有文名，於黨軍攻下武漢時，以善演說，能把握民衆著稱；但初次出席新聞會議，即令各國記者感覺失望，郭廳長報告時握拳高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末日到了！日本軍閥的崩潰就在眼前了！」這種作風，早已成過去，向記者談話，不是向羣衆講演，抗戰入股，不是新聞，新聞記者是最冷酷的觀察人，他們採訪正確消息，並不注意詞令，更不注演說姿態，你有好消息發表，聲音再低，姿態再劣，他們也歡迎；你如果沒有好消息供給他們，就是喊破喉嚨，手舞足蹈，也是白費。我國當局每每不注意這問題，歐美各國政治家一切演講，廣播或發表文字，都以報紙爲對象，用報紙所用文字，用報紙所用體裁，每篇文字中都要有報

紙可以拿作大字標題的字句，因為近代化的世界上，報紙是宣傳最有力量的工具，離開報紙，等于離開羣衆，長篇大論，洋洋萬言，無頭無尾的文章，每每叫記者們找不到精采點作發電的材料，報館裏編輯們無法寫引人注意的標題，甚至于記者們不發電報，報社裏將稿子遺棄不用。

新聞會議席上一年間，也發生幾件趣事，有位女子報告中國婦女抗戰工作，各國記者都很興奮的前去聽此報告。這位女子全副武裝出席會議，可是很明顯的，她對於穿軍裝，並沒經驗，一面說話，一面刺刀老是往地下落，又要說話，又要佩刺刀，忙得滿臉大汗；她說中國婦女訓練婦女抗戰工作，記者們問她如何訓練方法，她說如同訓練男子軍隊一樣，步槍射擊，機槍掃射，均在課程之列，並且還訓練女子放大砲，愈說愈不像話，結果是各國記者都溜之大吉，到會議終場時，只有三位記者在場。這種情形，雖然可笑，同時實在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外國人不明瞭，以爲這就是中國婦女的代表，以爲這就是中國人的作風，我們時常埋怨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情形，看不起中國人，我們不能完全怪別人，有時候也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自己的無聊言行，使得外國人誤

解我們，看不起我們。

還有一次，是某部一位發言人向各國記者報告國內情形，記者們問中國因為作戰，收支不能相抵，外債能否照常還本付息？這位次長不加思索的答覆說，當然停止付息還本。結果是第二天我國公債在倫敦紐約市場上，大跌而特跌。雖然民主國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發言權，可是如以代表政府的資格發言，情形顯然不同，我國有些發言人普通都犯幾種毛病：（一）缺乏常識，說話太幼稚，自己不看報，不研究最近國際形勢，不注意政府中其他負責人發表的文字，自己所發表的話，不是分文不值或文不對題，就是與其他負責人所發表的話，有重大矛盾。（二）好出風頭，處處想表現自己有超人見地，或想賣弄詞令，結果是醜人多作怪，不但自己被人恥笑，還損害民族國家的利益和威信。（三）有問必答，記者只要問，他們必定答覆，以為如果不能答覆就是示弱，殊不知，這是很錯誤的觀念，不知道儘管可以不答，連知道的事可答也可不答；不屬於自己負責的範圍以內的事，也就知道也無答覆的義務，同時也不應當予以答覆。（四）說話不誠實，最使新聞記者起反感，不利的消息，不全是不應當發表的，有時不利消息的發表，可以引起國內外的同情，可以得

到有利的效果。那種消息能發表，那種消息不能發表，發言人事先應當慎重研究，不能說儘可不說，可是發表的消息，不能離事實相去太遠，欺人一次容易，欺人二次就不容易了。一旦失去信用，以後無論說什麼話，不論真假，人都不相信了。另外一種人，以為誇大，就是宣傳，說得天花亂墜，胡說八道，不知道新聞記者是有經驗，有訓練的觀察者，那能瞞過他們？不但白費精力，還給他們一個極不良的印象。

漢口工作一年中，通訊工具也很令人滿意，路透社將電台交予中央社時，曾商定路透社在中國國內各地記者，前往上海遠東總社電報可交中央電台拍發，我二十六年到漢口後，上海有一電台，專與漢口中央社電台通報，每日清晨至深夜不斷通報。我由漢口每日發往上海電報，平均總在二三千字，差不多隨發隨到，十分便利。在南京時與交通部所定辦法，每晚發廣播電報四百五十字至倫敦，到漢口後，仍然准許繼續，漢口電報局總工程師費立權君，辦事極負責，予我以多方協助；故一年中倫敦每日都可收到我所發的消息，倫敦總社對於漢口方面消息的供給，十分滿意。同時，進來的新聞也有辦法，路透社與交通部訂立合同，每日由上海發往漢口新聞由交通部派報務員抄收，每月由路透社付抄報費，抄

報員就在漢口分社編輯部工作，上海發出新聞漢口立時可以收到；一面發英文稿，一面送中央社翻中文發表。除正常交通工具外，在漢口外籍記者，還有一走私路線，就是英美停於漢口江岸之砲艦，根據國際無線電協定，正常電訊交通隔絕時，海軍無線電台可以代記者發新聞電，但在漢口時，正常交通工具仍然照常通報，依照法理，英美砲艦本不應代記者發報，事實上英美砲艦代記者發報已是公開秘密，美國記者尤爲樂意由砲艦發報：（一）美國砲艦無線電台工作相當迅速，（二）避免我國當局檢查電報。（三）不出報費。我在漢口一年中，從未利用英國砲艦無線電發報，因爲根本沒有此必要，我對同上海倫敦通報情形，已極滿意，而且這種違反法令走私辦法，外籍記者利用，因治外法權我國當局無法制止，我是中國人，豈能知法犯法；雖然有人在外國通訊社工作，利用砲艦發報，發表些離奇消息，我也只好嘆口氣，恨我們中國人不爭氣，缺少公民守法精神，以逍遙法外爲榮，以違反法律爲特殊權到。

在漢口一年生活的優裕，也是初料所不及，到漢口後住江邊一白俄人所經營之旅館內，再遷至三教街，佔有整個三樓，計有臥房，客廳，洗澡間、客房、下房、廚房共六間，

客廳外對街有極寬大之涼台可坐十餘人，家具火爐均路易十四世式，窗簾有兩層水電衛生設備一應俱全，出門即漢口最富麗的三教街，購買什物、吃小食、看電影，甚為方便；一年生活狀況，幾與戰前在南京時無甚區別，同業多人，在法租界萬國旅館包一房間，作為俱樂部，每晚在該處相聚，無形中成為漢口之新聞大本營，好景不常，有台必分，轉瞬間國軍西移，同業星散，來重慶後，每有「人心思漢」之感。

十六 一個女記者的自殺

在漢口，兩位女外籍記者，都有相當文名：一位是斯墨德萊小姐，一位是額德萊小姐，斯墨德萊小姐，美國人，以介紹中國共產黨內幕於國外，與史諾並重於世。額德萊小姐，英國人，以「泥足的日本」聞名於世。我記得我第一次會見斯墨德萊小姐，是在新聞會議席上，她剛由山西八路軍戰區來到漢口，向各記者報告八路軍作戰情形，她無疑義地是一位八路軍崇拜者，她的宣傳技術非常巧妙，並不誇張八路軍兵力，或攻擊任何方面，只描寫八路軍士兵生活，反日抗戰精神，我記得她最後結束談話時，描寫一位小兵，只有

十五歲，坐在山頂，俯視冰天雪地的戰場，橫吹短笛，一片「起來」歌聲，隨之而起。這一段引人入勝的報告完畢後，掌聲雷動，給各外籍記者一很深刻的印象。我國辦宣傳的人，多半只注意宣傳不是誇大自己的戰果，就是批評別人，不是自拉自唱，就是村婦罵街；而宣傳的結果，不只等於零，反要引起不良的反應。替八路軍作宣傳的，還有一位卡爾生上尉，他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佐，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副武官，由北平經日軍陣地至八路軍戰區，再轉漢口。到漢口後，就向各外籍記者報告八路軍作戰情形，卡爾生上尉是軍事專家，所以對於八路軍的組織，訓練，裝備，素質和戰略報告的特別詳細。他稱八路軍爲「歌唱軍隊」，無時不唱歌，無處不唱歌。美國海軍對於他這次發表談話，十分不滿意，勸他回國，經迫他辭職退位；卡爾生回美國後，寫了一本書，詳述中國軍隊的組織及近況。日美戰事爆發後，卡爾生再度入伍，曾率領挺進隊襲擊馬金島，獲得輝煌戰績。

額得萊小姐，瘦長且近視，好批評人，可是人極熱忱，來漢口後，曾去瑞昌前綫；她對於我國前方不照料傷兵及後方傷兵醫院管理及設備之不完善，極力抨擊，並向某當局面述目觀狀況，促起當局之注意，因之遂有軍醫署人事之調整及戰地服務團之成立，爲我傷

兵造禍不淺。除以上二位外，還有一位女記者威金生小姐，紐西蘭人，她在中國的遭遇最為悲慘：她到漢口時，正是台兒莊勝利後，徐州陷落前，她請求我當局准許去台兒莊前綫，董副部長顯光勸她不要去，說女子到前方有很多危險，且有不方便的地方，她說男子看不起女子，待遇不平等，竟放聲大哭；董副部長被鬧得沒有辦法，最後答應她，只要到英國駐漢口總領事代為請求，彼可照准。她去見總領事，總領事也勸她不要去，她照樣大哭一場，結果她勝利了，由平漢路轉隴海路去徐州。到了徐州，前方軍事當局仍然不允許她到前綫去，這位小姐意志堅強，自己雇了一匹小驢，由台兒莊北上，不幸不數日徐州失陷，威金生小姐身落敵手，日人最初以為她是白俄女子，備加污辱，後來發現她是英國女子，纔護送她到青島，交予駐青島英國總領事，在香港醫院中休養後去倫敦，因刺激過甚，神經錯亂，不久竟在倫敦醫院中自殺。同業聞之，均傷悼不已。

十七 兩面鏡子

在漢口的外籍記者被我國當局驅逐出境的，只有一位。這一位是丹麥人艾思革倫，年輕無識，任上海大陸報記者，到漢口不久，就發生一不幸事件。那時日軍沿江西犯，漢口

形勢吃緊，我方沿江岸建築工事，軍事當局滿街張貼佈告，不准在江邊拍照；董副部長顯光因各外籍記者有攝影機者甚多，深恐不明禁令，干犯法紀，乃於新聞會議席間，特別宣佈此項禁令，嚴囑各記者切勿在江邊拍照。不想會議散後，同日下午艾思革倫即去江岸拍照，爲我軍事當局拘捕，彼堅稱禁止拍照事，彼毫不知情，我當局亦不願小題大作，乃從寬發落，於下班飛機去香港時，送彼出境。新聞記者以爲違禁漏檢是努力不是不對的，不獨自己受窘，也影響一般同業們的工作。很多外勤記者，埋怨檢查制度，說好新聞都被扣，不扣的沒有好新聞，他們不是不努力，就是白費力，自尋苦惱，專門去搜集些違檢資料，不只毫無用處，甚至有時引起當局的懷疑他們專門搜集違檢資料，是否另有作用？因此我覺得，官方對於新聞記者的傳統疑忌態度，固然應當改正，同時記者們本身，也應當注意到自己的修養和操守，造成我們在社會上應有的地位。

個人私生活，本非他人所能過問，惟爲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則對已對人都有欠妥之處，很多才能超人的記者，因爲不注意自己的私生活，誤事誤己。在漢口就發生這種事件：紐約講壇報記者金維多，爲人忠厚，是一位有經驗，有能力的記者，惟一短處，就是好

杯中物，終日酒醉不醒，他由上海到漢口，預備停留三數日拜訪我國當局後，即轉回上海。國際宣傳處代約於某日上午分別往見三要人，清晨八時，國際宣傳處外事科季科長澤晉去彼住處陪彼往見某部長，彼竟醉臥不起床，好容易叫醒，勉強穿衣起床，一進某部長住宅，見有洗澡間，金先生請季科長先進客廳。彼即去洗澡間，季科長與某部長在客廳久候，金竟毫無動靜，季科長跑進洗澡間，見這位金先生臥在浴盆內已酣然入夢，趕緊拖他起來，走進客廳，他開口就稱季科長爲某部長，季科長連忙指着某部長說，他是部長，我不是部長，幸而好，某部長健談，不要人問，他就長篇大論的說下去，這一次拜訪，就這樣結束。同日上午還去拜訪了汪精衛和王寵惠，訪問完畢，這位記者居然還發了電報，到當天夜裏，這位記者忽然酒醒了，一口氣跑道國際宣傳處，連稱不好，原來他發電報時汪精衛的談話變成王寵惠的談話了。這一齣很滑稽的故事，可以證明新聞記者無論有多大才能，不自己注意自己的私生活，必定會誤事，甚然影響自己一生的事業。

十八 做傻子？還是做聰明人？

作新聞記者，處處得罪人固然不好，可是畏首畏尾，處處怕得罪人，也每每妨害自己的工作。漢口路透社經理格羅漢巴羅，幼年在上海路透社商業新聞部做學徒，一年一年的苦幹升任爲漢口分社經理，因爲過去環境和社會地位關係，以與官方來往爲榮，認英國駐漢口總領事爲神聖不可侵犯之人物，覺得當地匯豐銀行怡和洋行等經理爲地方權威，生怕開罪各方，發一條消息，都要徵求各方意見，結果是這樣消息不能發表，那樣消息也不能發表。我的立場就不同，只要是好消息，消息正確，我就發。英總領事那時正計劃成立難民區，我國當局極力反對，理由是南京難民區計劃完全失敗，人民生命財產，並無保障，再者漢口難民區之設立，徒徒給人民一錯誤觀念，以爲可得到安全，不願撤退。當時我就把我方反對設立難民區之消息拍發出去，巴羅君極爲不滿，向我說他已答應總領事不發這類消息，我不應使他爲難，我的答覆是：他的苦惱是自尋的，新聞的發佈，假如是記者不能自主，完全由別人支配，新聞記者就喪失新聞記者的天職，出賣了自己的人格。這場官司，竟打到遠東總經理那裏去，結果是各不相干，各人發各人的新聞。也許我作人太不聰明，爲發新聞事，得罪中外各方的人頗多，我的立場向來以新聞爲主，別人却不諒解。比如

：英方說我反英，中國人說我親英，兩頭不討好，雖然是工作了多年的記者，碰了十多年的釘子，但我的老皮氣，還是改不了，更奇怪的就是我並不勸後進青年放聰明些，人類的進步，事業的成功，必定要有傻子，世界現在並不缺少聰明人，所缺少的還是傻子。

十九 五分鐘謁見蔣委員長

凡到漢口的外籍記者，無人不整天逼着董顯光先生，介紹他們去謁見蔣委員長，差不多都先後被接見了。有一天董先生同我說，他要介紹我去見委員長，同時事先說明只作五分鐘談話，到了中央銀行二樓，董先生手裏拿着錶看時間，那種情景，更叫我心裏感覺到極端不自然，可謂窘到萬分。那時，漢口情形吃緊，據云委員長已準備去南嶽，我就報告委員長倫敦總社來電，派我作委員長行營隨軍特派員，希望將來到任何地點，該處有完好交通工具，不但把我方消息不斷拍發國外，還可將最後國際消息，轉達給委員長。過了一分鐘，委員長說你最好到重慶去。談話也是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事實上，我的願慮，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從漢口到南嶽，該處只有一條軍用電話綫通衡陽，一座無線電台在衡山，中央社

也只剩一架手搖發報機在南嶽通長沙，電報發不出去，也進不來，無法工作，結果還是照委員長的指示，到重慶去。

二十一 與周恩來的一段公案

我二十六年到漢口後聽說周恩來也在漢口，我就想去看他，中日戰事爆發前，我會兩次去江西，目睹國共軍苦戰情形，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內部情形，所得資料並不多，一個不公開政黨，多少含有神祕性，同時在江西所搜集共產黨所發行的報紙和刊物，裏面有很多周先生所寫的文章，我早就渴望能和周先生談話，苦無機緣。打聽得周先生在漢口的住址後，立刻就寫信去請求約定時間，前去拜訪，接到周先生的回信後，很興奮的如期去見，不想跑到八路軍辦事處，聽說周先生剛剛出門，掃興而歸。寫封信予周先生痛責他失約，他回信很客氣，說因臨時接蔣委員長電話，有要事即須過江一談，因此失約，十分抱歉，並另約時間去談。我和周先生見面是在辦事處樓上客廳裏，該處原為日本商店，牆壁地板，一切裝設俱為日本式，二人圍一日本火爐，長談約一小時，周先生態度非常誠懇坦白，共產黨的缺點也直言不諱，給我一很深刻的印象。想不到我對於他的估量，後來竟一日不

如一日，談到中國共產黨問題，周先生的分析，可以說是頭頭是道，但是在他接見外籍記者時，軍事，經濟，政治，無所不談，軍事專家未必是經濟專家，研究一個問題，已經不易，什麼問題都要自命為專家，難免沒有說外行話的危險，同時好說話的人，容易失言，周先生有一次在重慶，酒後發揮政見，因而得罪了某將軍，竟歸過記者，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有失政治家風度，我當時很想把那次談話經過，原原本本的登一啓事，後來經許多朋友勸阻，這場筆墨官司，纔算告一段落。

日軍攻陷武漢的前四天（十一月二十一日），我離漢口經公路去長沙，停留一宿，即往南嶽，該處交通工具等於零，消息進不來出不去，久住南嶽的計劃，不得不打消，決去重慶。在公路上走了兩星期，經衡陽，桂林，柳州，貴陽到重慶。沿途雖然感覺到西南後方文化，經濟，政治，交通的落伍，同時也親眼看到西南天然資源的豐富，地域的廣大，人民抗戰意志的堅強，以及新兵訓練的普遍，不由人不對於抗戰必勝之信念，更加堅定，到重慶後我就發一長電，詳述沿途所見情形，並向總社報告，中國抗戰前途仍極光明，絕無崩潰危險，重慶原由史密斯（前在南京分社服務）主持，我到重慶後，奉總社命主持重慶分

社事宜，調史密斯去昆明。

廿一 初到重慶的觀感

初到重慶時，外電檢查，改由外交部情報司辦理，原來是國際宣傳處辦公地點在城外兩路口巴縣中學，各記者均在城內，檢查電報，雙方均感不便，乃由外交部情報司負責。我所發上海電報由中央社小樑子總社電台拍發，發倫敦廣播暫停，漢口英文自由西報已遷至重慶出版，主筆陳欽仁兄約我每星期寫兩次幽默專欄，題如「重慶內幕」，想不到外交部當局竟因此事發生小小內部爭執。自由西報向由外交部主持，此欄刊出後，外部中一部份人覺得文字欠嚴肅，不合戰時需要，一部份人反對此議，覺抗戰不一定事事都要嚴肅，幽默文字可以調濟戰時過度緊張空氣，雙方各執一詞，無法解決，五四轟炸後，自由西報暫時停刊，我也借此理由，不再繼續撰稿。這件小小的事，可以表現我國一般人士，每每看事過於嚴重，歐美各國報紙雜誌中，時有諷刺當時人士，社會狀態之文字圖畫，即當事人亦多一笑置之毫不在意。在我國則非同小可，認爲侮辱。我記得英國外相艾登乘飛機抵加

拿大時：飛機降落在河邊泥灘上，機身甚高，並無扶梯，艾登躍身而下時，跌得個五體投地，滿頭滿臉全是泥土，爬起時連聲向歡迎人員說：「對不起！我這樣狼狽的到達貴土」。這段新聞，英國報紙和通訊社都大登特登，在我國一定被扣，不是說有失外相尊嚴，就是說有損國家體統，要是刊載出來，當事人一定大事震怒，利用自己政治地位，來向報紙作報復行動。美國報紙，話劇，電影，時常和羅斯福總統及其夫人開玩笑，羅斯福本人從未介意，美國官方亦從未干涉，我們政治漸趨民主，社會也應當養成一種「運動家的風度」(Sports man ship)就是勝而不驕，敗而不怒，能忍受別人的攻擊，能了解賞識幽默的美妙，不要事事過於嚴肅，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

廿二 太太幾乎死在大轟炸中

在重慶工作的五年中，最緊張的階段，要算「五三」和「五四」的轟炸，「五三一」那天的中午，我正同陳博生先生在都郵街冠生園吃飯，忽然放警報，陳先生主張去國民參政會防空洞，我建議去外交部防空洞，那知道陳先生帶錯了路，走到繡壁街軍事委員會門前時已

放緊急警報，路上斷絕交通，幸而我帶有通行證，二人一口氣跑到外交部時，敵機已在頭上。眼見炸彈飄飄下落，陳先生俯臥地板上，我一個箭步衝進工友防空洞口，適巧外交部在半山中，山上山下都會落彈。山下大公報館中彈起火，一時週圍四處火起，路透社在白象街，左右五十碼內落彈四十枚，內人謝蘭郁正在房中午睡，對門五碼處落一彈，幸未爆發，不然恐性命難保矣。自中日戰事爆發以來，在南京漢口等地，日人轟炸向未狂炸市區，故絲毫不感覺轟炸之可怖，「五三」以後，再也不敢在外逗留了。那天晚上，下半城景况淒慘，無水無電，街邊放着一排一排的死屍，每具死屍的頭後，死者家屬替他點一枝蠟燭，燭光搖曳，如入鬼境。「五四」那天，原與蕭同茲先生等約定下午六時在小樑子中央社相會，同去晚餐，中午警報，直至下午四時半仍無敵機影蹤，據云警報已解除，市民均紛紛返家，去中央社前，先去社中發稿，至六時，正擬去中央社時，工友突報敵機已由南岸入市區，當時已無法躲避，只好聽天由命，幸而那天敵機僅僅狂炸上半城，生命得保無恙。敵機離去後，見上半城由小什子至七星岡，一片火光，我屢搖中央社電話，均不通，又聞小樑子被炸，預料中央社難保，發電報事恐有問題，乃自提打字機，令工友二人攜帶

把工作
做口
吸樣
和自然

報紙及複寫紙隨後，去中央社看看中央社各人安否。如中央社被炸，則勢必另行設法發報。沿途見各處盡是火頭，街上人擁擠不堪，扶老攜幼，提着衣物向城外走，小孩兒找父母，妻子找丈夫，一片喊哭聲，極盡人間慘狀。走到復興關巷口，見中央社已全歸於燼。工友稱蕭社長等均安好，已回私寓；乃轉身去大樑子電報局，局中無一人，等了好久，跑出一人，我捉住他說我要發電報，他從頭至腳把我看了一看，以為我是瘋子，把後門一開，火頭直入收發室，他指着火向我說，「你還要發電報」！轉身就跑了。中央社電台及電報局既然不能發報，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請英國大使替我由兵艦發電報了，於是再離開大樑子往七星岡，街旁兩邊大火，房屋倒至街心，我從火焰中穿過，絲毫不知畏懼為何物，人們經過這種悲慘情景，感覺個人的渺小和生死的平凡，腦筋已失工作能力，不知不覺向前走，並無一定方向，也無一定計劃；走至七星崗，遇見新民報的趙純繼先生，他告訴我「英大使館也被炸」，我於是決意去英大使館，但是七星崗領事巷口起火，不能通過，乃由工友帶路，繞道至英大使館，網球場上死傷滿地，英總領事布魯能正一手提洋油燈，一手拿着一瓶白蘭地，給傷重者喝酒，他見了我很悲痛的說：我既無法救他們的生命，又不懂

得救傷的方法，只能盡我的心力，來減少他們的痛苦，等救護隊來了，我們纔走進飯廳。正房屋旁邊落一炸彈，前面落一燃燒彈，屋裏滿地全是破玻璃和天花板上落下的泥土，那時莫大使館卡爾及英兵艦艦長都已趕來，我把電報寫好，由英總領事簽字，交艦長帶回拍發。我想發報問題既已解決，就安心繞道回白象街寓所，到家時，已早晨三點，想不到我的電報，當晚並未發出，因大使館所發電報太多，我的電報到第四天纔送到上海遠東總社，同時美國記者由美國兵艦發出電報，當晚都已到美國。倫敦總社因此事向英國海軍部抗議，英國海軍部的理由是（一）海軍無代發新聞電的義務，（二）照章官電必須先發，官電未發完時，不能發新聞電。官方與新聞界的合作，英國遠不如美國，近年來，英國的國際宣傳趕不上美國，這不能不算是一重大原因。他們沒有想想：政府豈能離民衆？而民衆的日常生活糧食，民意的製造廠，就是新聞事業，扶助新聞事業，予記者以便利，就是加強政府的力量，發揮民意的威權。林主席逝世後，官方已正式公佈消息，而外交當局不准各國記者發電，理由是外交部官電還未發出，這種理由，近似滑稽，因為外部自己工作慢，不能也要別人慢。

廿三 我和我的學生們

在重慶幾年和中央政治學校和復旦大學新聞班系學生的接觸，是令我最感覺愉快的一件事。我一向對於新聞學校沒多大好感，而竟對於新聞學系學生如此情誼，實非初料所及。在美國米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雖想在新聞界打出江山，然時時感覺到新聞學校給學生們準備工作的不足和學校教授能力經驗的薄弱。回國後看見當時我國新聞學校多半都是野鷄學校，某大學新聞系主任，根本沒有作過新聞記者，對於新聞學術毫無研究，拿了新聞系主任招牌，到處招搖，作個人政治活動，令我對於新聞學校的印象，一天比一天壞。到重慶不久，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程滄波先生約我教英文新聞寫作，由白象街到學校（菜園壩）相當遠，我向來不想作教書匠，更不想教新聞學課程，到學校上課後，發現學生英文程度頗不整齊，最初打算只教一學期，想不到後來竟不但撒不了手，反對於一般新聞學校學生，發生極深厚的感情。「五三」、「五四」轟炸後，復旦大學搬至北碚，新聞學系三四年級學生仍留重慶，住化龍橋，他們知道英文程度較差，不能學習英

文新聞寫作，乃請求我改授新聞採訪；我說化龍橋太遠，我無法去上課，於是他們決定每星期來我處上課一次，男女同學由化龍橋步行進城，這種求學精神和至誠，令我十分感動。

上課學生人數既少，上課又毫不拘形式，大家散坐一室，採用一種談話方式，每個同學個性能力，我都十分清楚，相處一年或二年後，由師生而成先後同業，同時，他們畢業後與我也仍然不斷往來。

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馬星野先生，是米蘇里大學新聞系先後同學，在來重慶前，雖從未晤面；但是久仰他努力新聞教育有年，關於新聞學術著作頗多，中政校新聞班開課，由潘公展氏擔任班主任，馬氏擔任副主任，他約我去學校講演，雖然小溫泉在南岸離城甚遠，往返幾需一整天，我仍很興奮的答應他去。在中政校上課和在復旦，情形不同，中政校上課時，學生人數極多，並且大半是具有新聞事業服務經驗的，所以決定採用講演方式，偏重于理論教育，每每一起到學校就開始講演，一講就是二小時，講完又趕車回重慶，來去匆匆，和學生絲毫沒有私人接觸，連學生的姓名都不知道。按理如此師生，絕無感憤可言，但有多數政校學生，畢業後在重慶工作，時常來我處談天，比在學校時，關係

要密切得多，像後來奉總社命派樂恕人君任中國入緬遠征軍隨軍記者，就是一個例子。根據這幾年的經驗，我感覺得新聞學校本身一定得有刊物，最好能有日刊和週刊兩種，給學生以充分實習機會，免得新聞學校出來的學生被同業譏爲外行。同時上課方式，最好改作談話方式，師生間可藉以發生私人感情，學生不得到學術的指導，還可得到教授人格精神的感化，學校課程不應完全注意學術，技術與學術課程應當並重。

廿四 我看新聞教育

我在學生身上費了很多精神時間，看來似乎有點傻氣，實在不；然我離開新聞學校後，從事新聞事業的時間愈長久，愈感覺到新聞學校的重要。新聞從業員大致可分兩種：一種純粹職業化，拿他當一種職業養家活口，只求維持飯碗，沒有前進創造精神和意志，另一種則拿他當一種事業，時時想改善，時時求進步，新聞界裏科班出身者，通常犯一種毛病即事事從職業着想，只求保守，不求進步。新聞學校的用處，就是一方面訓練新聞記者的技術，一方面薰陶新聞記者的道德和意志，使青年記者走進新聞界後，不但能勝任愉快的

，還時時努力改進新聞事業，研究新技術創造新作風，提高記者的水準和地位。但是在中國，新聞學校和新聞事業當中還缺少聯繫，新由學校畢業的學生和新聞從業員當中，也缺少聯繫，新聞學校脫離了新聞事業，等於紙上談兵，新聞學校學生沒有富於經驗的老記者們在旁提攜指導，每有無從下手之苦。我初出學校時，就有這種感覺，今日我有機會能幫青年記者們一點忙，也許等於替我們前輩還債；希望以後新進同業們，不會再有我們現在所感受的痛苦。同時和青年在一起，是件最愉快的事，有位朋友年過六十，而精神身體如三十許人，他的老當益壯的祕訣，就是常和青年人在一起，青年人的興奮與前進精神，對於老年人有種一強心針作用，處世愈久，愈感覺到世界的複雜污穢，青年的純潔可愛。然而青年人們也有短處，他們有時過於理想，不顧事實只批評別人，只埋怨現狀，而欠缺自身反省和原諒別人的美德，因此造成磨擦，被先進所疾視。青年人應當謙虛禮讓，繼續不斷求學，不爭地位，不爭待遇，以苦幹精神求學識，以工作成績得地位。同時，新聞學校也應當力求改善，不要虛有其名，既無好教授，又沒有給學生實習機會，課程不適合需要，這樣只有誤一般青年，妨害新聞學校的前途。每年送一大批不成熟的新記者進新聞隊伍裏去

，對於新聞學校的前進，新聞事業的前進，是相當危險的。

廿五 長沙觀戰·鄂西祝捷

在重慶五年，曾去前線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去長沙，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六月去鄂西。第二次長沙會戰時，日人堅稱曾佔領長沙，我方司令長官則謂日軍並未侵入長沙，日人稱自動撤出長沙，我方謂日人被擊敗潰退。駐滬外籍記者乃請求去長沙前線，得悉真象，經我當局許可後，乘專機飛桂林再由桂林乘車至株州南淶口站，換乘木船，順湘江至長沙。同行者有美聯社記者慕沙，塔斯社葉夏明，台衆社費盧，雪梨晨報麥唐納，中央社律鴻起，英國武官佛雷絲，美國武官馬克倫，國際宣傳處沈劍虹和軍令部鈕先銘。

新聞記者行動，目的當然是尋找新聞，所以急急忙忙要趕到長沙，得點新鮮資料。下午到桂林，當晚就乘車去衡陽，想不到衡陽南，專車突停駛，據云前面有敵機活動，各人下車跑到附近山裏暫避，等了半天，毫無動靜，回到車上，仍無開車消息，離車站不遠，有鹽務緝私大隊駐該地，同學趙君邁爲主管人，派車前來接去遊玩，下午車開衡陽，城中

白日無人，全去郊外跑警報，景况極爲淒涼，入夜則頗爲熱鬧。到衡陽換粵漢路車時，發現車上侍應生爲南京國際聯歡社之侍應生，相見之下，驚喜萬狀，有如「他鄉遇故知」，次早到豫口，第九戰區長官部派來招待之人通知各人下車換乘木船去長沙，據云豫口橋被炸不能前進。有幾位記者表示木船太慢，爲何不乘汽艇。長官部方面解釋說：湘江佈有水雷太危險，水也太淺，汽艇不能行駛，各人只好上木船順江去長沙，江水碧清，費盧、葉夏明和麥納唐都躍身入水，來回游泳。船到湘潭，忽然停開，長官部來人稱：明早由旱路去長沙，大家又羣起抗議，水路短又快爲何不坐船，長官部人說下面有水雷，大家說眼看見有很多木船由湘潭開長沙，爲何他們不怕水雷？結果還是照原來計劃起早去長沙，小路上走了兩天，到長沙後已人倦馬乏，下榻岳麓山農場。次晨，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薛氏將第二次長沙會戰經過詳爲說明，再渡湘江進長沙城，城內十室九空，街上行人極少，商店住宅門窗均用磚封閉，要重街市有防禦工事，警備司令夏師長楚中報告城區作戰情形。下午去瀏陽河前線，沿途日軍砲火炸彈擊毀房屋甚多，次晨各記者再度進城拜訪長沙城內外國教士及湘雅醫院醫士，據外籍教士談：日軍確曾攻進長沙城內，司令部設湘雅醫

院，我軍撤至湘江對岸，日大騎兵曾到株州，我空軍轟炸瀏陽河日軍陣地，我砲兵並曾向長沙城內轟擊，予日方以重大損傷，日軍僅佔領長沙北部，夜間不敢外出，我遺留於長沙城內之部隊，夜間時出襲擊，日軍在長沙無重砲亦無機械化部隊，想係因我方事先早已將道路澈底破壞，敵人運輸極感困難，日軍雖佔領長沙而終仍撤退，此為重大原因之一。敵人攻進長沙，完全依賴空軍協助作戰，用飛機低飛轟炸，並以機槍掃射掩護步兵前進，敵人攻進長沙及由長沙撤退時，長沙城內均無激烈戰事，長沙會戰真像始得大白：日軍確為我軍擊退，並非自動撤退，因道路被澈底破壞，敵人重兵器無法運至前線，我軍在敵後方猛力追擊，敵人孤軍深入，不得不撤退，敵軍進長沙後，曾登記外人產業，並招集市民大會，確有久佔之意，撤退並非初衷，實可想見。我得悉真象後，曾細加考慮，最後決定將真正情況，據實發表，敵人攻進長沙已為不可掩避之事實，同行有英美武官，彼等已由外籍教士口中得很多資料，勢必將真象報告政府，而長沙失守事並無掩飾之必要，戰事進行中，城市之得失為必然之事，日軍攻進長沙，有久佔意，而終被我軍擊退，是何等光榮戰績，沒有掩飾理由，不如自己公佈事實，承認戰區當局有錯誤，還可糾正國際間的印象。

無論從新聞記者立場或是從國際宣傳立場來看，只有作忠實報告一條路。於是，我就把長沙會戰經過，據實發電，我後來很欣慰的發覺，重慶當局採取同樣觀點，把我所發電報，一字不改的放行，同行各位記者以爲長沙曾經失守消息一定被扣，不敢發報，到重慶後發現我的電報全被放行，驚豔不止，實在這是他們沒有把這問題細加研究的緣故。

鄂西前線之行，在我國國際宣傳上得了很大的收穫。三十二年五月底敵人沿江西犯，攻下天險漁洋關，進窺重慶門戶石牌要塞外圍，全國震驚，敵人頗有揮軍入川之勢；賴我軍全力反攻擊退敵人，在渝各外籍記者，請求去鄂西前綫一行，經幾許稽延，至六月十一日始得成行；同行者有紐約時報愛金生，倫敦泰晤士報佛爾門，紐約講壇報多瑪拉女士，美聯社沙利文，塔斯社西寧立可夫，合衆社王公達，攝影記者康色勒，中央社曾恩波，乘協慶輪東下，過三峽，恩施、巴東、三斗坪，到宜昌對岸之石牌要塞區；歸來後，各外籍記者無人不興奮樂觀：（一）戰區各長官之誠懇，實堪動人，陳司令長官辭修，吳副司令長官奇偉，接見記者，幾乎無話不談；對於我方死傷數目，及我方作戰失利情形，很坦白的說出，對於美國空軍協助作戰的情形，也是功罪分明，一點不客氣。（二）我軍前線作戰部

隊之精銳，訓練體格裝備之優良，作戰精神之堅旺，可以打破國外輕視我國軍隊作戰能力之成見。(三)前方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機構之有組織，上規道，使得各外籍記者感覺中國前途有希望，我由鄂西前線回來後也興奮到了極點。一到前綫，心地就爲之大快，同時愈向前線走，愈覺得前方是青年人的世界。在鄂西，只看見青年，老官僚，老政客，幾乎絕跡；處處都是新氣象，一種朝氣，你不得不感覺到愉快和興奮。我希望在後方工作的同業們，有機會就去前方走走，換換空氣，知道中國有作戰的人，有作戰的精神，不是每個中國人都要居在後方，靜等別人拚命，而自己名利兼收。

廿六 破房茅屋的歷史勝地——重慶外籍記者招待所

經過五三五四的轟炸後，重慶城內一片瓦礫景象淒涼，各機關紛紛遷移到郊外辦公，在城內各外國記者採訪新聞拍發電報均有困難，國際宣傳處乃於巴縣中學內建築外籍記者招待所小樓一座，樓上有房七間，樓下六間，洗澡房二間，首先搬進者爲國際宣傳處美籍職員武道先生，我和葛郁住樓上左翼二間，先後搬進者有合衆社，美聯社，哈瓦斯社，紐約

時報，倫敦泰晤士報，德意志通訊社，英國時事週刊等記者，招待所乃成爲重慶外籍記者的大本營。國際宣傳處近在咫尺，我方招待外籍記者各種會議，均在國際宣傳處會議室舉行，檢查發往外國電訊，亦改由國際宣傳處負責，中央社已由城內遷移至兩路口辦公，外籍記者到重慶，爲工作便利起見，幾有非住招待所不可之情形，人數愈來愈多，國際宣傳處乃再添建飯廳及平房十餘間。三十年夏，敵機狂炸重慶，招待所全部被毀，是年秋，國際宣傳處乃重建招待所。太平洋戰事爆發後，英美記者來重慶工作者，日益增多，乃於三十一年添造房屋十四間，三十二年中宣部聘請美國新聞專家多人來渝，住所又感不敷分配，遂於三十二年秋再加築樓房七間。四年來，英美報紙新書中，關於招待所內人物及生活多有記載，這一頁採訪生活史，確有補誌的價值。

招待所裏各記者，朝夕相處，情感頗融洽，而新聞競爭，則熱烈無可倫比，尤以各通訊社爲尤甚。各人千方百計，鉤心鬪角，無時不在競爭中；美聯社與合衆社爲死對頭，彼此監視之嚴密，幾有寸步不離之情況；某日我中樞某要人約外籍記者晚餐，合衆社記者未去，美聯社記者得信後，亦不敢赴宴，怕合衆社記者另有活動。各記者均屢有信差專送電報

，合衆社一喊信差，美聯社卻胆戰心驚，深恐被合衆社佔先，趕即向各處打電話，問有無重要事件發生，美聯社辦公室中，電話鈴一響，合衆社立即打電話問中央社有無重要新聞發表？彼此都發加急電報，威爾基來重慶時，美聯社於一日內發出一千餘字加急電報，緊張熱烈可以想見。

倫敦泰晤士報記者佛爾門，原爲紐約時報記者，因種種原因，被紐約時報辭退，另派愛金生來華，佛爾門花樣最多，不擇手段，去過一次青海，竟寫一部西藏探險記，在美國到處講演西藏情況，宣稱曾娶過西藏公主，並與西藏馬賊相處多時。到重慶後，也曾賣弄過他的老戲法，三十一年春，緬甸戰役正在激烈進行中，駐緬各記者，因交通發生障礙，乃公推記者一人來重慶代發電報，該記者一下飛機，佛爾門即大事招待，並警告該記者謂招待所裏一般記者，有如狼羣，必須小心，不然好消息都要被他們偷去了。這位初次來重慶的記者，信以爲真，感激到五體投地，把曼德勒城大火情形，一五一十的完全告訴佛爾門，那位記者，忙了一天，纔領到發電執照，等他拍發電報時，他的報館來一急電告訴他：紐約時報佛爾門，已由緬甸逃出難民談話，描寫曼城大火情形，有聲有色，你在緬甸所

作何事，還不趕快去訪問那位難民；把這位記者氣得半死，回電說：那位難民就是我。還有一次。這位佛爾門先生異想天開，發一電給紐約時報說：「美國根據租借法供給中國軍隊之味噠布，被人盜賣，我政府乃派憲兵、警察滿街截住穿味噠布衣褲之人，在街頭強迫脫去衣褲，因之多人赤身露體跑進衣店搶購衣褲」。美方得此消息，大為震驚，對於美國供給我國物資問題，議論紛紛，而事實上，美國供給我國之味噠布，尙在印度，並未到達中國，重慶亦無街頭強迫脫去衣褲情形，我方乃向紐約時報提出嚴重抗議，同時美國軍部亦否決佛爾門爲戰地記者之申請，紐約時報乃決另派名記者愛金生來華。佛爾門身體肥胖，食量亦大，菜一上桌，彼卽匙筷並下，狼吞虎嚥，杯盤爲之一空。同桌人憤恨之下，乃共謀報復，某日佛爾門由河南災區歸來，菜方桌上，忽有人於電話中請佛爾門講演災區情形，老說不完，同時彼之同桌記者，開始總動員，等佛爾門回桌時，不但菜已吃完，連飯都不餘一粒，氣得佛爾門狼狽異常。

美國讀者文摘雜誌記者霍塞君，寫作頗有功夫，後改任美國星期六晚刊記者，因自命不凡，頗爲同業所嫉視。某夏日深夜，霍塞已入眠，記者多人，羣坐草地納涼，某惡作劇

者，於院中捉一鴨，放進雀塞臥房中，驚醒雀塞；彼以電筒滿室追鴨。各人狂笑不已，彼盛怒之下，跑至院中以電筒射人，問是何人所爲？大家一語不發；彼回屋就寢後，各人再將鴨子放進房中，這幕戲一夜連演三次，雀塞實在忍受不下，次早即決離開重慶赴昆明，並向人發誓：「永遠不回重慶」！去昆明後，寄給此間友人一封信，紙上只畫鴨子一隻，寫了「刮刮」（鴨叫聲）二字，可見遺恨仍在心頭也。

生活雜誌及時事週刊記者白修德，於二十八年自哈佛大學畢業後，奉國際宣傳處擔任助理編輯，在比間鬱鬱不得志，後代時事週刊撰稿，二十九年夏生活雜誌及時代週刊主人魯斯夫婦來華，白修德大賣力氣，頗爲魯夫婦所賞識，白修德乃隨彼等返美，一登龍門，身價十倍。太平洋戰爆發後，白修德任戰地記者，由澳洲轉印度，再度回重慶，三十二年間，曾去河南災區，並赴新疆一行，白修德身材短小，滿身黑毛，夏日喜赤身臥招待所草地上，作日光浴，見者多搖頭不止，白修德能操華語，文筆俏皮，小有才而自命不凡，爲記者中間報銷能手；在重慶時，每月向時事週刊報銷生活費約九百元美金，每月薪金可全數不動用，因此紐約總社雖多次來電催彼返美任總社編輯職，彼均置之不理；同業中對白

修德最感不滿者，即彼太好說話，話匣子一開，很不容易停，只有他說話，別人無法開口，威爾基來重慶時，彼之隨員二人與各外籍記者作私人談話，報告威爾基在渝行動，但是二人尙未開口，白修德已大談其中國近況，口如懸河，滔滔不絕；當時各同業憤恨之情形，可想而知，該晚假如白修德被人暗殺，招待所內各記者均將有重大嫌疑。

美聯社記者慕沙，由香港調來重慶工作，雖非採訪人才無跑新聞本領，但係看家好手，晝夜不離辦公房，依電話爲命，中央社有消息發表，不論事之大小，均拍電至紐約。所以同業們閒話時，多數均對新聞檢查過嚴，表示不滿，而慕沙獨持異議，他很坦白的表示：新聞檢查愈嚴，於他愈有利，因凡是公佈消息，他可保障不漏，要是沒有新聞檢查制度，就無法和別人競爭了。慕沙爲人極慷慨好友，家中每日均賓客滿座，大吃大喝，他在重慶，只有兩種嗜好：喝酒和打撲克，時常自午飯後起，不斷的飲酒到次晨三時止，他賭撲克也不計輸贏，無論有牌無牌，每次跟進，故有「永不撤退的慕沙」之名。雖近來技術上頗有進步，但據云一年來所負款項，已逾數萬金。彼年齡並不過大，而頭髮完全脫落，喜說笑話，愈粗野愈好，每感太太在座，不能言所欲言，乃趕太太進房睡覺，而

太太却也想聽，堅不進房難免爭辯一番。這齣戲每晚總得上演數次。三十二年夏天，慕沙忽然文興大發，開始寫部長篇小說，以戰前上海西人生活爲背景，他人汗流浹背，熱得半死；而慕沙則晝夜工作，房裏打字機聲不停，寫了約兩個星期，至第七章時，忽又中止，連聲說天氣太熱，等秋涼後再寫，十一月已到，冬季將臨，慕沙何時繼續撰稿，尙無消息。

滿城衛報記者史坦，兼任倫敦每日電訊報記者，原籍德人，因係猶太種，於希特勒當權後，改屬英國籍，處處怕人不以他爲英國人相待，故見英國人，就稱「我們」，聽來實在有點肉麻；那種英國味，比英國人還來得濃厚百倍，偏偏他的人緣又最不好，同業們很少有人和他來往；戰前他住日本，專門研究日本經濟問題，他的思想，他的工作，都偏重於經濟方面每次我國政府發言人招待外籍記者時，史坦必問及中國物價問題，問得我方發言人也煩了，同業們也煩了。他曾去印度，取得了英國戰地記者資格，在重慶每天都穿着戰地記者制服，各處奔走，而幾年來從來沒有去過前線一次，雖然照例美國駐軍軍部應當承認英國戰地記者的資格，予以相互待遇，可是對於史坦，則絲毫不客氣，予以閉門羹。

史坦的長處，是真能苦幹，每天時時都在寫稿，關於經濟財政問題，他也確有研究，且時常有新意見和資料提供。

駐華外記者聯誼會會長是紐約時報記者愛金生，愛金生來華雖不到一年，但爲人之忠厚，才學之淵博，已爲重慶中外人士所欽仰。愛金生身材瘦小，帶眼鏡，留小鬍子，善於詞令，談吐舉動，極溫文多禮，來華前，任該報戲劇欄編輯多年，在美佔戲劇批評家領袖地位。太平洋戰事開端，因受戰事影響，紐約劇壇漸趨沉寂，且國家多事之秋，男兒應赴沙場報國，不應困守後方，彼遂辭去戲劇欄編輯職，改任戰地記者。來華工作後，所寫重慶劇壇動態，怒江前線巡禮，鄂西行等文；均經美國各報紙及雜誌轉載，愛金生寫作的優點，就在他以極平凡及極生動的文字，描寫在華所見所聞，不誇張，不修飾，內容無一字虛假，感想均出諸至誠，讀他的文章，看不到驚人的新聞或文字，可是餘味無窮，印象極深；中外人士都喜與他接近，幾無日沒有人請他吃飯談天。他來中國後，對於我國平劇，十分讚賞，覺得編劇的緊湊，演員表情動作服裝的美善，遠非歐美話劇所能比。他對於中國的友誼，出於自然，與有些外籍記者借與中國友善之名，增進私人利益與地位者不同，

他時時擔憂中美關係，他看到美國駐華軍隊，因無與我國上等人士來往機會，以致不能了解中國情形，時常誤解所見所聞，假若這種報告到美國去，至少是不能增進中美的兩國人民的友誼，可是怎樣能改善這種情形，他也沒有想出若何具體辦法。

招待所裏的人物，雖然是形形色色，可是攝影記者，有他們獨有的風格：大刀闊斧，粗野強悍，有點草莽英雄的氣概；開口就談女人，三句話要帶兩句詈罵，十位有九位沒有讀過書，極峯社（合衆社之附屬攝影社）記者甘色勒就是這種人物。他在在紐約街頭流浪，硬打出自己的江山，戰地記者照章須着軍服，這位甘色勒，向來衣冠不整，衣褲不燙，皮鞋不擦，有天給史迪威將軍看見，叫去罵了一番，並說有損美軍榮譽。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甘色勒衣冠整齊，恐怕須等來世。英國戰地攝影記者多塞，更是好人，據他自己告人，他結婚後數日，即離英國去北非，戰場工作，他結婚那天晚上，送新娘進房後，他的朋友拉他下樓飲幾杯酒，一杯又一杯，喝得大醉，回洞房時，在樓梯上一臥不醒，次晨新娘自己下樓，把他抬回洞房。他的攝影機，又笨又大，抬了滿處跑，同業們都和他開玩笑，說他是古董商，他氣憤不過，到處解釋，說他的攝影機，是一件法寶，沙

漠中風沙不入，出入槍林彈雨中，不易損壞，把攝影機放在地下，自己站在上面跳，而絲毫無損。國際社攝影記者白朗德，自開羅帶來一本裸體影集，招待所裏視爲至寶，彼此傳觀，他在重慶的女友，是位波蘭女子。生活週刊的攝影記者邁斯登的作風，就和他不同，邁斯登是世界名攝影記者，與其妻合作工作，他照像，他的太太寫文章，他們在芬蘭的作品爲舉世所推崇。二人極幽閒文靜，晝夜工作，夫妻彼此極相敬愛，而工作時則極認真，他的太太，完全是站在助手地位，一切都服從邁斯登的調遣。邁斯登夫婦本擬由重慶飛莫斯科，後爲某種原因，未能獲得蘇聯當局之同意，乃轉去馬尼拉，非島陷落時，進集中營，此間友人均爲彼等担心，近聞已於三十二年十月間第二次交換僑民時平安返回美國。

招待所裏的生活，頗爲沉悶，偶而也有幾次鬧熱的場面，三十二年元旦日，外籍記者曾舉行過一次話劇公演，描寫招待所裏的生活狀態，形容得淋漓盡緻。還有一次合衆社請客，合衆社記者馬丁大醉，在招待所草地上表演美國足球撞人技術，一時草地上，東倒西歪，墮下了好幾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廣播記者司徒華，首當其衝，倒在冬青樹叢裏，爬

起就跑，中央社曾恩波，腿部受傷，另有一位由坡上直滾到坡下；馬丁仍四處找人，作表演試驗品，駭得招待所裏住客，東藏西躲，恨不得背生兩翼，飛上天去；直等馬丁回臥房將床桌椅凳都搗毀後，睡在地板上，大家纔敢伸頭露面，進行「復員」。

雖然，外籍記者們常埋怨招待所裏電話不靈，燈光不明，自來水不來水，屋頂漏雨，四壁透風，滿房老鼠，但令人不解的就是凡會住過招待所的人們，雖遠在倫敦或紐約，仍然念念不忘此地。時事週刊記者賈可柏於澳洲殉職後，其老母特捐資予招待所建築花園，以紀念其愛子；各國來華作家回國後的寫作，關於招待所裏生活，都有些描寫，想不到這幾間破房茅屋，也竟成爲歷史勝地。

廿七 新聞發佈的幾個問題

我在重慶工作，最感覺頭痛的，交通困難要算第一件。林故主席逝世後，逝世消息，須等中央社發表，纔能發電，一般外籍記者，都不知道這消息，夜裏全已就寢。我午夜得着准許發表的消息後，立刻發急電去紐約，而適美國電台已停止工作，我又發急電經成都

轉倫敦，滿以爲此消息決可比別人早到幾小時，其他記者次晨七始時開始發電，不想到事後始得知；那晚重慶成都綫路有障礙，我的急電到次日正午始發出，真叫作「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我除發電至紐約外，每夜寫廣播約四百字發往倫敦，倫敦抄收後，作專電發稿；假如抄收有把握的話，這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因爲電訊遲緩，由重慶發倫敦電報，平均約四小時至六小時，急電約半小時至二小時，而廣播隨發隨到；有幾次重要消息，都是靠廣播比別人佔先。蒙巴頓將軍到重慶的新聞，就是最近的一個例。問題就是廣播毫無把握，有時因爲電力忽然中斷，廣播發不出，有時因爲氣候關係，倫敦抄不到，白費一番精力；每天都有「靠天吃飯」之感，精神上的苦痛，無上倫比。我國的國際交通工具，確有改善和充實的必要，不然將時時感覺到我國消息太慢和不夠的缺點。

還有一件極容易解決而至今尙未改善的問題，就是新聞發佈時間問題，我國有一傳統觀念，就是新聞只要夜間十二點鐘以前發表決可見報。在國內確是如此，可是在國外則不然，一則時間不同，深夜發電，趕不上國外報紙，再則即是僅僅趕得上，各記者因爲時間關係，不得不減縮字數，只發急電，而到國外後，因爲時刻過晚，見報時不能刊登在顯著

地位，我方公佈消息的目的，希望能在國外廣爲宣傳，如果消息不能見報，或刊載字數不多，或僅能刊載於少數報紙，完全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豈不可惜？我國國際交通工具，不夠應用，受時間物質的限制，每每僅有幾張急電，可以當時發出。我覺得我國發佈消息的時間，應當盡力提早，予記者以充分時間，發往國外既可以按時見報，又可增加發往國外電報的字數，英美現已普遍採用預先發表新聞的方式，十日公佈的消息，於九日八日先交予各記者，由各記者發電註明於十日發表，既可無臨時電訊擁擠之弊，又可予各報館以充分時間，準備刊載於顯著地位，預爲撰寫社評。此種方式採用以來，從未發生報館或通訊社不守信用之事，同時宣傳當局，應與交通當局取得密切聯絡，如有重要新聞發表，應事通先知交通當局作種種準備，或延長通報時間，或整理綫路，或增加綫路，以免臨時發障礙，稽延電報，而影響宣傳。

廿八 專談新聞檢查

重慶新聞檢查之嚴，影響外籍記者在華工作甚大，普通的習慣，是非等中央社發表不

放行，能發出的消息，不是戰報，就是官方所發表的新聞，記者個人的觀察，判斷和預測，幾乎絕對不准放行。由重慶發到國外的新聞，因此有乾燥無味之病。檢查過嚴，逼得記者們與檢查員鬥智，想盡種種方法，來在平凡的電文裏，透露重要消息。

戰時新聞應當受檢查，這是中外一樣，絲毫不可反對的天經地義，可以研究的有兩點：一責任問題，二範圍問題。目前我國的檢查制度，責任在政府，英美的檢查制度，責任在記者，英美檢查員只扣軍事外交秘密，其他新聞一概放行，消息是否正確，意見是否合理，檢查員一概不管，目前我國的辦法，是除禁止登載的消息扣留外，凡是消息不正確，意見與我方不一致者，也不准放行；這種辦法，有兩種弊病：一、政府責任太大，檢查員難免有疏忽或一時看不到的時候，這消息如果發生問題，記者絲毫不負責，因為檢查員已蓋章准許放行了。三十一年夏天，佛爾門發出一電報說：我國有人盜賣美國卡嘰布的事，就是一個例子。他堅不認錯，我方也無法採取嚴厲處置，因為事實上該電曾經檢查員放行。我個人覺得最好的辦法是由記者負責，除軍事外交秘密，一概扣發外，其他消息，各記者可自由發電，如有問題，完全由記者負責。政府儘可警告，或停止新聞記者應有之一切便

利；如情節嚴重，甚至可驅逐出境。二、記者完全不負責，等於政府鼓勵記者偷漏走稅，千方百計洩露機密，萬一有問題時，政府無法採取嚴厲處置，而徒受新聞封鎖之罪名。

關於範圍問題，這問題實在難，新聞檢查也實在不容易，今日必扣的消息，明日也許可放；同樣消息，不同的寫法，就有很大的區別。我個人的意見覺得：檢查範圍應當很廣泛，看發電的動機，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要是善意的就是責我甚嚴，也應當予以放行，錯誤和過失都是人類所必有的事件，國家民族的偉大，不能被一件事或者一個人的過失，完全掩沒。能認錯，必定能改進；反而言之，不認錯或掩藏過失，就是暴露自己的弱點。目前我國檢查制度，都是注意國內人事問題，生怕某條消息的登載，會見罪於某機關或某長官，結果社會的黑暗，無法訴諸公論，國策的取決，人民無法供獻意見。同時英美輿論，竟有我國並不民主之謬論，新聞檢查之過于苛刻，實不能辭其咎。只要新聞的動機是善意的，消息的內容正確的，我們應該准許放行，這樣纔能使得新聞事業，充分發揮他的能力和功用。

新聞檢查不過是一種消極工作，我們同時應當注意到積極方面，看見英美當局的作風

，我們很自然的感覺到：我國當局確未能充分利用新聞記者，作有力的國內和國外宣傳，邱吉爾羅斯福等與新聞記者，幾有晝夜不離，相依爲命之情況；凡有重要會議，必有新聞記者在場，雖不能參加秘密會議，至少記者們時常有和他們接談的機會。羅斯福視察美國全國作戰生產情況時，總統專車上有四位記者（美聯社、合衆社、國際社、路透社、）邱吉爾首相訪美時，兵艦上也有路透社記者隨行。英美在各戰區作戰部隊，均有戰地記者，戰地記者受軍人同等待遇，得有交通衣食住種種便利，戰區司令長官每星期必接見戰地記者兩次，詳談戰爭最近形勢，有時並說明將來作戰計劃，使得各記者十分明瞭該戰場情況。反過來看看我國各方對待新聞記者的態度，實在不能令人滿意。重要會議，每每沒有新聞記者在場，想見要人，比登天還難；抗戰已近七年，而我國軍隊中尙無戰地記者的規定，新聞記者到處喫閉門羹，新聞的來源，到處都封鎖，結果是打開每天報紙，千篇一律，全是官方公佈消息，沒有一點生氣，沒有一點精彩；報紙等於政府公報，新聞記者等於抄寫員。也許有一般人覺得新聞記者的要求有點過份，想享受特殊待遇，事實並非如此，二十世紀的世界，政府脫離不了民衆，國家民族的真正力量在民衆，民衆假如不明瞭時局真

象，不能得到各方面的意見和觀感，等於叫瞎子帶路，那種民意不會是健全的；時間長久後，危機之大，可以想像得到。一方面，我國政府和社會，應當改變對待新聞記者的態度，另一方面，我國新聞界本身，應當猛力反省。十五年來所見，潔身自好的記者，固然很多，但是我們不必避諱，記者當中，也有很多不自愛的，態度手段的卑劣，學識能力的幼稚，令人看不起，甚至遠避三舍。我們應當時時注意同業們的修養問題，時時研究技術事業的改進，使得政府和社會自然而然的予我們以適當的待遇。

廿八 新聞寫作質疑

我國新聞寫作的方式，這幾年來雖有改進，然尚不能脫離中古時代敘事的老方法，直寫方式，是英國報紙前二十年所採用的方式，同寫短篇小說的體材相似，從頭至尾，按事情發生的先後直寫下去，如果寫某人自殺的新聞，先述某人居住何地，曾任何職務，平日生活及家庭狀況，再寫自殺的前後經過。看報的人，必得要從頭至尾，慢慢看下去，看到最後一段，才發現某人已自殺，現代寫新聞的方法，不是這樣，都採用倒寫方式，就是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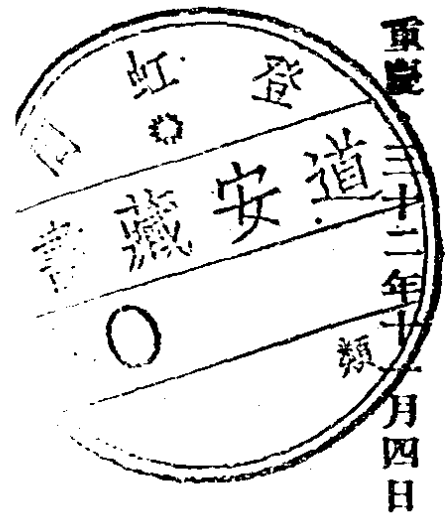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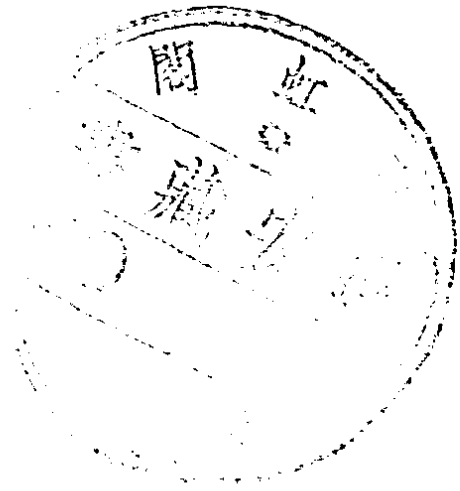
後的消息，最精彩的一段，寫在前面，後面再補述過去的經過，這種方式有幾種優點：（一）引起讀者注意，讀者一看頭一句，就知道這條新聞的重要性，提起他的興趣，不必等全篇看全，才知道怎樣一回事。（二）節省讀者時間，讀者都是很忙的人，沒有時間把整個報紙裏的每條新聞都看完，倒寫方式，可以予讀者以選擇機會，一看頭一句，就可以決定是否再看下去。（三）便利寫標題，編輯部人員工作極忙，不能每條新聞都要看完再寫標題，最精彩的一段，如果寫在前面，寫標題時，一定感覺到許多便利。（四）便利印刷，報紙最後版面，常因臨時增加重要新聞，必須更改，原有新聞字數，勢必減少；用倒寫方式，後面幾段，儘可隨意刪去，而絲毫不影響該條新聞之重要部份。根據以上理由，我覺得應當開始訓練一般記者，用倒寫方式寫新聞，在很短時期內，我國報紙版面，一定可以比以前更爲生動。

本市新聞的重要性，和所具號召讀者的能力，不次於政治軍事和國際新聞，我國報底前有一普遍現象，即太不注意本市新聞，各報外勤記者，幾乎拿全副精神來採訪國家大事，很少寫本市新聞；就是寫本市新聞，也只輕描淡寫，敷衍幾句，結果是打開報紙，只看見

國際新聞和公佈的軍政消息以及要人演講，本市新聞，僅在最不重要的角落裏，透露幾行。各報內容，都差不多，僅僅是版面和標題略有出入。戰時報紙固然應當較為嚴肅，但是人類最關心的事，還是衣食住行問題，凡是直接影響讀者個人日常生活的事，都能引起他的注意，辦報的人，應當注意這一點。採訪新聞的人更應當注意到這一點。依照英美報紙的習慣，本市新聞至少要佔整個報紙篇幅一半，理由很簡單，本市新聞的精彩，可以增加報紙的銷路，可以配合地方需要，並且可以拉取廣告。同時，讀者最愛看的，也是本市新聞，報館裏最得力的訪員，都是以全力奔走本市新聞的，本市新聞的寫法，也都是花樣百出，寫得有聲有色。我希望各報，不要再看輕本市新聞，新聞記者不要再認為跑本市新聞是大才小用，要知道：跑本市新聞，是新聞採訪的基本訓練，今日成名的記者，大多數是當年跑本市新聞的能手；同時跑本市新聞，也是件很容易很辛苦的工作，不過採訪新聞的記者，永遠不會顧慮到艱難和辛苦問題。

二九 尾聲

我担任採訪工作十五年，自己覺得經驗不夠，學識更不夠，要研究要學的地方太多，替新聞戰綫寫這篇文章的動機，絕對不是自我宣傳，因為我根本於新聞事業，於新聞學術，絲毫沒有貢獻，更沒有與他人爭名利，爭地位野心。也許有人會見笑，說這樣平凡的經驗，也值得一寫，未免太不自量，我的動機很單純，就是希望：把我從工作得來一點經驗，貢獻於未來的記者們，我的錯誤，他們可以設法避免，我這裏想到的幾個問題，提出來請求同業們予以研究。最後要把我對於未來記者們的幾個希望寫下來。（一）新聞記者為終身職業。（二）永遠不脫離採訪工作和生活。（三）愛護新聞事業。愛護新聞記者的地位。（四）愛護同業砥礪共進！



重慶 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

天地出版社 股份有限公司重慶版本書目

- | | | | |
|----------------|-------|-----------|------|
| 蔣委員長傳 | 蔣星德著 | 遙望(三幕劇) | 李慶華著 |
| 中國之命運表解 | 陸 鏗編 | 金指環(三幕劇) | 陳 銓著 |
| 偉大的西北 | 蔣經國著 | 花影淚(電影劇) | 趙清閑著 |
| 反攻緬甸 | 樂恕人著 | 柳暗花明(三幕劇) | 王進珊著 |
| 日本漫話 | 朱雲影著 | 戲劇插曲 | 張定利著 |
| 拿破崙的生活 | 鄭學稼著 | 銀國內幕 | 江上鷗著 |
| 薛政漫談(增訂本) | 陳果夫著 | | |
| 中美中英新約文獻(英漢對照) | 沈 鐸編 | | |
| 關於女人 | 男 士著 | | |
| 採訪十五年 | 趙敏恆著 | | |
| 偉大作家論寫作 | 徐中玉編譯 | | |
| 文藝寫作經驗談 | 葉紹鈞等著 | | |
| 壯志凌雲(四幕劇) | 陶 雄著 | | |
-
- | | | |
|--------|---------|---------|
| 安徒生童話集 | 石童子 | 匈牙利民間故事 |
| 獵人的幸運 | 從動物園歸來 | 孩童文選 |
| 易兒學戲記 | 小 鷹 | 明貴旅行記 |
| 島的故事 | 冰島漁夫的故事 | 北極探險記 |
- 少年讀物 湯增敬 主編
郭尼迪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再版（上海）

採訪十五年

著 者 趙 敏 恆

發行者 天 地 出版 股份 有限公司

重慶民生路一九二號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二樓

再版印刷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總經售 國 際 書 報 社

上海福州路公和里五號

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定價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字第四七八號